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_____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新时代我国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及其解决策略

研究生姓名： 高梦欣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赵锋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研究方向： 中国人口经济

提交日期： 2022年5月30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高梦欣 签字日期：2022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李超 签字日期：2022年5月30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高梦欣 签字日期：2022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李超 签字日期：2022年5月30日

The Familie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nd Its Solution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New Era

Candidate : Gao Mengxin

Supervisor: Zhao feng

摘 要

在十四五以来的新发展时代背景下，随着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问题面临多重冲击，使得该群体的生计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严重影响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产业大军，如何在新时代化解生计风险、降解生计脆弱性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亟需解决的难题。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本研究在现有国内外文献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概述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流动人口的群体迁移现状和家庭生计风险。基于问卷和收集的统计数据，构建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评估体系，对不同生计模式下的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水平进行测算，其后利用计量方法以实证分析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和家庭生计风险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从流动人口的生计现状和风险来看，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和社会保障质量低，存在显著的社会保障风险；同时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受限。流动人口的学历较低，甚至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工作技能培训，致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力低，存在较大的失业风险；最后是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人口流动的同时产生留守老人问题。长期缺失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不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也使流动人口陷入养老风险中。（2）从家庭化流动特征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来看，家庭功能完整性和外出务工时间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其进一步提高可以增加对风险的适应性。但是家庭老龄化程度则又会对家庭生计脆弱性进行抵消，从而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相应的影响家庭生计脆弱性水平。（3）提高收入水平可以提高流动人口家庭转移或规避风险的能力。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家庭人均月收入可以通过提高适应性从而降低生计脆弱性。（4）基于流动人口在家庭生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脆弱性水平影响因素，新时代制定流动人口解决家庭脆弱性的策略应从政府和流动人口自身出发。

关键词：流动人口 生计风险 生计脆弱性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ith the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livelihood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ies are faced with multiple shocks which makes the livelihood of this group present a certain vulnerability,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Floating population acts a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forc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that how to defuse livelihood risks and degrad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urgent to be solved in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Based on the exis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results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overview,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group mi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family livelihood risk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collected statistical data, an assessment system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constructed, and the vulnerability level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of floating population under different livelihood modes is measured. Then, the impact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risk on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s empirically analyzed by using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livelihood status and risk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not perfect and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is low,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social security risks; Mean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limite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low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has not even receiv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which leads to their low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great unemployment risk. Finally, the weakening of family support function. With the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old people arises. Long-term lack of emotional comfort and life car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mak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pension risk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act of family-oriented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on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family functional integrity and time of out-migrating for work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ies, and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vulnerability can increase the adaptability to risk. However, the degree of family aging will offset the vulnerability of family livelihood, thus affect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family livelihoo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family life cycle. (3) Increasing income level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ies to transfer or avoid risks.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 household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can reduc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by improving adaptability. (4) Based on the risk and vulnerabil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livelihood development, we should mak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vulnerability of family livelihood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aspec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

Keyword: Floating population; Livelihood risk;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目 录

| | |
|---------------------------|----|
| 1 引言 | 1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1 |
| 1.1.1 研究背景 | 1 |
| 1.1.2 研究目的 | 2 |
| 1.1.3 研究意义 | 2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3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3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5 |
| 1.2.2 研究述评 | 8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9 |
| 1.3.1 研究内容 | 9 |
| 1.3.2 研究方法 | 10 |
| 1.3.3 数据来源 | 10 |
| 1.3.4 技术路线图 | 11 |
| 1.4 可能的创新 | 12 |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概述 | 13 |
| 2.1 概念界定 | 13 |
| 2.1.1 流动人口 | 13 |
| 2.1.2 生计脆弱性 | 13 |
| 2.2 理论概述 | 14 |
| 2.2.1 人口迁移理论 | 14 |
| 2.2.2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 16 |
| 2.2.3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 17 |
| 2.3 理论评述 | 18 |
| 3 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现状和风险分析 | 21 |
| 3.1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与流动形态 | 21 |

| | |
|------------------------------------|-----------|
| 3.1.1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 | 21 |
| 3.1.2 流动形态..... | 23 |
| 3.2 流动人口家庭就业稳定性、生计模式和生计策略..... | 26 |
| 3.2.1 就业稳定性..... | 26 |
| 3.2.2 生计模式..... | 27 |
| 3.2.3 生计策略..... | 28 |
| 3.3 流动人口的家庭保障状况..... | 30 |
| 3.4 流动人口的家庭住房状况..... | 31 |
| 3.5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 | 33 |
| 3.6 流动人口家庭生计可持续困境..... | 33 |
| 3.6.1 社会保障不完善..... | 33 |
| 3.6.2 就业质量提升受限..... | 34 |
| 3.6.3 家庭赡养功能减弱..... | 35 |
| 4 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测量与影响因素分析..... | 36 |
| 4.1 变量选取与解释..... | 36 |
| 4.2 生计脆弱性指标构建与测量..... | 37 |
| 4.2.1 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 | 37 |
| 4.2.2 生计脆弱性测算..... | 41 |
| 4.3 模型设定和检验..... | 44 |
| 4.3.1 模型设定..... | 44 |
| 4.3.2 相关性分析..... | 45 |
| 4.3.3 模型检验..... | 47 |
| 4.4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回归分析..... | 47 |
| 4.5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 52 |
| 4.6 结果分析..... | 53 |
| 5 流动人口家庭生计的解决策略..... | 54 |
| 5.1 完善家庭保障政策，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 54 |
| 5.2 完善家庭支持能力，降低流动家庭生活成本..... | 55 |

| | |
|---------------------------|-----------|
| 5.3 建立针对性培训机制，提高就业能力..... | 56 |
| 5.4 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的相应建议..... | 57 |
| 6 结论与展望 | 58 |
| 6.1 结论..... | 58 |
| 6.2 展望..... | 59 |
| 参考文献 | 61 |
| 致 谢 | 68 |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但是，受制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原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仍被隔离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孟凡强，2021；王亚军等，2021），性别、年龄、户口性质以及受教育年限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和稳定性还是存在着影响程度不一得干扰（梁海艳，2019；刘涛和王德政，2021；张丽琼等，2017；綦松玲等，2014），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也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率（宋全成和封莹，2019）。这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造成了极大威胁，极易使其面临失业、疾病及养老等生计风险。人口流动、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进步保持密切关系（王桂新，2021）。因此，积极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生计发展现状，化解生计风险，切实降低该群体生计脆弱性，不仅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拓宽了流动人口的就业渠道，但同时也使其面临更结构化的生计风险冲击。截至 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 3.76 亿人，占据全国总人口比重 26.61%。与 2010 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 69.73%，所占据全国总人口比重提高了 10.13%（国家统计局，2021），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单人流动比例逐年下降，根据早些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在 2017 年时流动人口家庭人口数在三人及以上的比例便已达到 53.5%，后期也在持续增加。由此可见，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大迁移、大流动的国内格局已基本形成，家庭化流动趋势日渐显著（王培刚，2021）。可在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下，流动人口状况会有社会保障缺失、住房状况存在差距的相关问题冒头(李宝礼等，2019)、以及健康状况逐渐变差和失业风险逐年增加等状况。

因此，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发展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关于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解决策略，防范流动人口的生计风险，有效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从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明确当前流动人口的群体和家庭生计风险特征、影响家庭生计脆弱性关键因素便是实现流动人口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和前提，也是提高流动人口生活质量和保障，从而进一步优化中国新人口空间格局分布，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1.1.2 研究目的

流动行为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虽然迁徙能够促使家庭生计的多样化和增加家庭收入，但是受到户籍制度、流入地较高生活费用等诸多因素限制，流动人口的家庭往往面临着生计风险。因此针对流动行为对流动人口家庭造成的影响，如何定量测度家庭生计脆弱性，以及不同生计模式下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有什么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基于此，文章从生计脆弱性视角对流动人口在家庭化流动行为影响下的家庭生计脆弱性进行研究，拟解决的问题如下：

（1）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找出能够表征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测度指标，构建文章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水平评价体系。

（2）探索家庭化流动行为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化流动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家庭生计脆弱性。

（3）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降解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风险和脆弱性水平的解决策略。

1.1.3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我们从流动人口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流动行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变化之后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既能够充分考虑到家庭在缓解家庭生计脆弱性所发挥的风险分摊作用，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新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家庭

发展的风险冲击。文章综合已有的家庭发展和脆弱性理论的研究思路，提供一个初步的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评价体系，并通过家庭化流动对生计脆弱性影响的机理和实证研究，为实现我国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意义。

实践层面，一方面从深入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生计的现状出发，准确把握新时代流动人口生计发展的新方向与新模式，从而为流动人口的生计可持续提供有针对性的策略建议。另一方面，掌握流动人口的生计风险及其家庭生计脆弱性，对提升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具有实践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我们之所以准确评估分析生计脆弱性，是因为其确切的估计可以帮助脆弱性主体制定更为有效的生计策略，促进实现其生计可持续。Chambers、Conway（1992）以及 Ellis（2000）将生计定义为包括能力/资产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和途径，Awumbila（2008）研究了加纳女性移民的特征及生计策略，通过对加纳地区女性的性别、贫穷和脆弱性等三方面相互交叉的社会关系来进行分析，讨论了用于克服贫穷以及处理生计风险和脆弱性问题的生存战略。然而这不同于停留本地的固定社会背景，在移民成为一个选择时，Mohammed（2016）将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们的迁移行为可以使家庭生计来源多样化，这样也能够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并降低其脆弱性，于是在这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意见。顺着此观点，Chandni（2020）则通过对移民和非移民家庭的生活史访谈，发现在家庭内部，迁移行为在减轻一些家庭成员脆弱性的同时，会加剧其他人的脆弱性，并强调迁移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家庭脆弱性的机制作用，对其适应性研究至关重要，这也在另一角度说明了迁移行为具有外部性特征，对于外部环境的生计可持续性会产生相应的成本。Sunan（2021）的研究则是依据实地调查，针对亚洲三个移民输出国家主导的显著发展模式，发现了跨国劳动力的

汇款和国家政策发挥支持性作用的地方往往会改善家庭生计，否则也会造成农村的再贫困和进一步加重家庭的生计脆弱性，Blukazc（2022）通过相应的调查，发现智利移民在新冠病毒大背景下自身的处境往往因为移民身份反而也会加剧其个人的身心健康风险，进一步加重了其自身的生计脆弱性。

在对生计的进一步研究中，学者们转而进行关于生计可持续性的研究，Prince（2017）将视角放于加纳内部移民，其收集了相应的大量数据将之采用混合方法，不同于以往的国内迁徙和减贫之间关系的缺乏，而是提出了内部移民对贫困和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部分且显著的受到移民目的地空间属性的影响，因而观察到大多数农村移民的社会经济和生计状况普遍得到改善，进而提出农村目的地为移民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以确保可持续的生计，Mallick（2020）的思路与之相近，认为每个人都会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移民恰好是一项不错的意向选择，因而评估了社会生态系统和生计条件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可持续生计对于生活在风险中的人们而言面对不同的风险状况采取不同的选择，当然这种生计的选择性也存在一定的风险，Justin（2021）研究南非的移民案例是便发现因为原国家的糟糕生活状况，部分群体被迫移民，为了生活不得已而去从事犯罪活动，反而扩大了南非国家的犯罪群体数量，所以制度是移民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当然，大部分移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正常生活，Khutso（2022）便选取了南非地区的国际女性移民青年的可持续生计，因为研究的困难度便使用个案案例研究，进而发现由于无证身份便极难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因此为了生计的可持续往往会采用极为卑微的手段来保证生计的可持续，结合Masango（2021）研究，巴索托妇女作为经济移民和非法移民，这样的身份在南非国家往往使得雇主对其存在偏见和不人道行为，这也恰好验证了可持续性在良好制度管理的缺乏下的难以实现。

以上便是国外在多个视角下的相应研究，其样本选取扩及亚非等地区，主要采用生计脆弱性评估和可持续性分析来进行对于各个地区的生计风险问题，站在这个立场上，采用相应的具体方法来分析流动性人口状况，其中包括流动性人口对于家庭而言的生计风险的来源和制度方面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并且论述了迁移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成本，从而也削弱了地区的可持续性，而

可持续性也会促使移民个体面对当下处境采取种种办法,他的就业和生计问题逼迫之下做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显然是更多的需要制度性因素来去解决的,对应的研究文献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2.2 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针对于流动人口生计风险的研究中,一方面,在研究领域上,罗小琴和桂江丰(2014)发现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摩擦以及摩擦原因仍然比较复杂,吴华安(2011)研究发现社会风险的结构和认知资本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对于生计风险的成因机制开展了有益且广泛的研究,而宋全成(2021)与李树茁(2008)则是研究在成因机制形成的过程对于机制本身影响作用的重要因素,针对具体的问题和流动人口的权益问题提出了很多实践性质的措施。面对生计风险问题的出现,苏丽锋(2020)和陈良敏等(2020)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流动人口自身和社会等两个层面研究并提出相应措施来去应对具体环境下的风险。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开展了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和生计现状水平分析(杨胜利和姚健,2021),以及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社会保障对于家庭生计的影响(冯伟林和李树茁,2016;吴玉锋等,2019;李树茁等,2007;石智雷和施念,2014)。然而,风险与脆弱性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左停等,2020),在Jia Xu等(2020)的研究中作者采取情境特定方法将之聚焦在南沙地区的移民进行脆弱性分析,确定了影响我国南沙经济特区移民的脆弱性维度,并基于此分析了该地移民丧失应对外部风险能力的原因,进而发现随着空间的扩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的脆弱性日益增加。而Xu Zhao等(2020)的关注则是搬迁企业员工这一特殊群体,使用“暴露-敏感-适应性”框架构建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分析搬迁企业员工应对风险影响的能力,最后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提出补偿标准计算方法,以缓解生计脆弱性,提升涉及成员的生计可持续性。Wang Chao等(2020)利用定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揭示女性农民工的生计脆弱性及其原因,并利用定性数据进行佐证和巩固,同时发现“仪式制度”是理解女性农民工生计脆弱性的关键,正是由于传统的性别规范使得农

民工女性群体难以享受到政策所带来的相应利益和资源，加重了女性群体的生计脆弱性，也阻碍了其可持续性，我们可以发现脆弱性和风险往往同时相互作用，也使得在这样情况下的个人很难摆脱类似的艰难处境。

在上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流动人口在进行迁移的过程中很难得到相应的保障，“苦难专挑命苦人”的现象不容忽视，然而其成因机制相当的复杂混合，多方面的原因相互交叉，我们从生计脆弱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去观察总结发现流动人口的生存处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就业质量方面。就业是流动人口家庭生计的主要实现方式，但是其就业状况受到个体因素、流迁因素和职业背景因素的综合影响，宋全成和甘月童（2021）发现流动人口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质量低以及不稳定的特征。首先，相较于本地居民，由于自身的生存技能较低、市场歧视等因素，流动人口为改善流动后的生活条件，被迫选择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以期提高收入水平，因此杨菊华（2011）发现在这样原因下的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是更长的，且部分流动人口因家庭化的流动方式，生活压力使其工作时间被进一步延长。根据 2016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以家庭化流动的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 54.61 小时，单独流动的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 51.54 小时，远超过于国家规定的劳动时间。宋全成和封莹（2019）的研究则是发现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劳动时间过长既损害了流动人口的身心健康，也不符合新时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其次，流动人口就业分布较为集中在第三产业，而高技术含量行业就业比例则相对较低。苏丽锋（2015）在这方面研究便发现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行业分布范围与发展长期受限，必然导致群体行业与阶层固化，甚至造成就业不稳定以及潜在的失业风险。因此可以发现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低，稳定性差。

其次，在健康状况方面。健康风险作为家庭重要的背景风险，对家庭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可忽视，相关研究主要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和慢性病患者率出发，认为流动行为导致的社会融入、生活压力、不良职业环境等是引起流动人口健康风险的重要因素。因而岳崴等（2021）展开相应的研究发现健康风险的冲击对于生计本就较为艰难的家庭而言，会大大加重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

对此方面的所造成的后果：流动时间越长，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越差，则是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尚越和石智雷，2020)。据学者统计，约 20%的农民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尚越和石智雷，2020），且长期迁移农民工的慢性病患者率显著高于短期迁移农民工。由此可以看出，健康风险普遍存在于流动人口群体。流动人口在进行流动活动后长期被负面情绪和迁移压力所影响，显著降低了其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了慢性病慢病率，存在着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健康作为社会民生的重要环节，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模式以及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提高。因此，一旦发生健康风险，流动人口生计资本极易遭受严重冲击，并对家庭整体的生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故而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存在较重程度的健康风险（石郑，2020）。

与此同时，在社会保障方面。学者研究发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不高，其参保水平也较低。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于社会保障的参保率不高，且部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贾洪波，2020）。因此石智雷和薛文玲（2015）也提出，长期保障预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生活意愿，也由于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工开始逐渐的回流。因此城市长期保障作为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它的缺失阻碍了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使得流动人口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年老后，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从而陷入生计困境，对此的预期使得流动人口回流，因而在社会保障方面，其作为规避生计风险的有效方式，对流动人口生计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为止流动人口缺失长期保障，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有限（石智雷和施玲，2016）。

同样不可忽视的问题便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日渐凸显，子女随迁成为常态，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也是城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有学者测算，2015年我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18岁以下儿童约1.03亿，占据全国儿童38%（史利丹等，2018）。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读公立学校的入学机会有限，从而不得不接受费用较高、教学质量难以保障的民办学校，这间接加大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压力。文萍（2021）考察了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发现，随迁子女初中辍学问题仍存在，义务教育后阶段在学率迅速下降。究其原

因便是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流入地城市面临的不平等的教育机会，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愈发严峻，义务教育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长此以往，子女教育问题将严重阻碍流动人口打破阶层限制和代际贫困。

最后则是家庭赡养功能方面。赡养功能可细化为情感慰藉、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三个方面，在已有文献关于人口流动对养老风险的影响中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种是人口流动对养老风险存在抑制作用，人口流动有助子女为父母提供更为优越的经济支持，是能够有效的抑制缺乏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缺位所带来的风险。另一种则是人口流动对养老风险存在不利影响（王小龙和兰永生，2011）。人口流动会拉大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空间距离，弱化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不利于父母的健康状况，从而加剧养老风险（朱玲等，2020；郑晓冬和方向明，2017）。以上两种说法虽然观点不同，但是都验证了人口流动对于家庭赡养功能都会产生一定的波动。同时，由于城乡家庭面临不同维度的养老风险，人口流动对老年人养老风险的影响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刘成斌和高翔（2018）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将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进行对比发现，农村老年人面临经济支持偏低、生活照料困难方面的问题，而城镇老年人面临更多的是情感慰藉方面的匮乏。这也得出结论便是人口流动使得家庭赡养功能弱化，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相应得困境（李树苗等，2021）。

1.2.2 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流动人口和生计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并且各有偏重。但是，生计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在对国外研究的论述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生计风险的原因和风险相互交叉，自身和社会原因都重重交合，很难去单方面的处理解决，因此关于生计问题的研究应注重多学科融合、多层次分析。在现有流动人口关于生计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是讨论了生计风险的空间特征分析，更进一步的去发现了生计风险机制和形成原因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应对，研究也提出了相对于此的应对策略。我们在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制度性因素是解决相关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因此应该多方面的评述和研究，会更加有利于解决策略的制定。

对于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和脆弱性评估的研究较少，尚未建立一个系统的框架体系。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流动人口是建设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方面出发，我们也必须得去关注对其的关注和保障。基于此观点，本文的研究结合人口迁移理论、生计可持续分析框架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来进行理论视角展开，为了保证结论的客观性，结合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开展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现阶段流动人口的生计特征和家庭生计脆弱性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识别影响流动人口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以期为其建立可持续生计机制提供参考建议，从而可以从更加完整的方面来去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和权益，更加稳定的推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为迈进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打好基础。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内容共包括以下五个章节：

第一章引言。本章主要阐释研究背景，明确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通过文献综述对目前国内外关于流动人口与其家庭发展所面临相关生计风险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本研究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并绘制技术路线图。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概述。本章对相关理论概念进行界定，并详细阐释本研究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通过梳理“推拉”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等理论成果，进一步理清各自理论基础下形成的分析框架，从而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理论维度和依据。

第三章流动人口的生计现状与生计风险。本章采用《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并通过年龄对流动人口进行群体划分，分别在年龄、性别、学历、职业、住房性质和户口性质等结构方面进行分析，厘清其社会群体特征。流动人口的流动形态包括流动时间、流动时间和流动范围三个方面。结合其社会群体特征和流动形态，总结当前的流动人口特征和现状，并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生计模式与生计策略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对当

前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等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章流动人口的 household 生计脆弱性评估。构建流动人口的 household 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并且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流动人口的 household 生计脆弱性进行测量评估。根据不同生计模式的流动人口家庭进行分组，进行对比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特征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为后续研究流动人口的 household 生计发展提供改善方法。

第五章流动人口 household 生计发展解决策略。本章基于流动人口生计发展现状和风险，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从政府和流动人口自身两个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说明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对目前国内外关于流动人口与可持续生计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准确了解此类问题研究脉络，找到研究的准确方向和切入点。

(2) 规范研究法：在相应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利用数据来构建关于流动人口 household 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对流动人口生计脆弱性进行测算评估。

(3) 计量分析法：在以上方法的基础上，我们为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进一步的使用线性回归方法来做相关性分析，从而发现每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因素和影响方向，更利于我们对指标的相应解决方式更具有针对性。

1.3.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1.3.4 技术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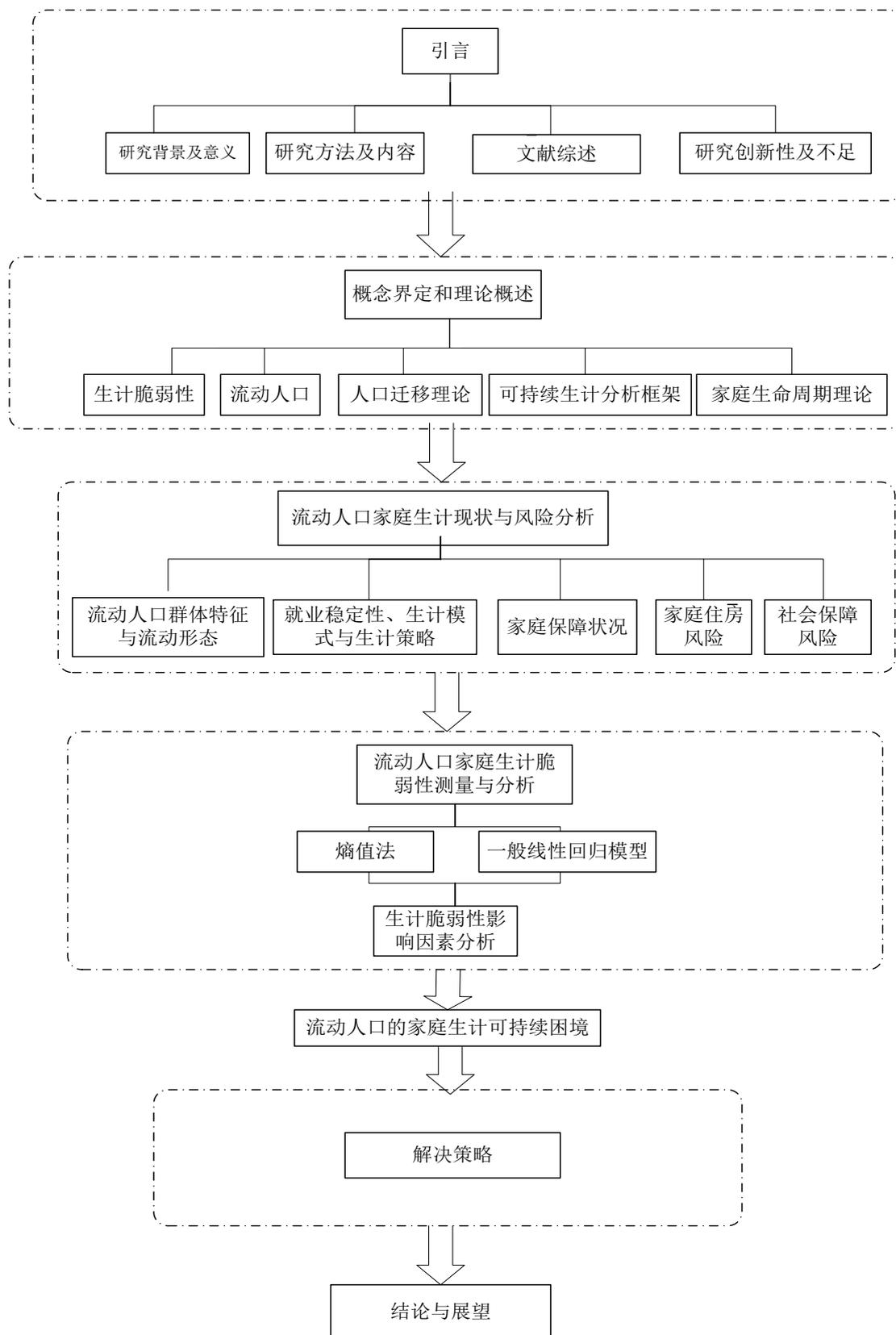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4 可能的创新

(1) 从研究层面来看，国外多数文献是集中在政府这个层面来谈论制度性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群体的影响，或者是集中于流动人口的自身层面的不可持续性，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也多是强调政策性原因，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行业的差异以及流动人口个人所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性，相较之下我们提出了个人和政府两个层面的结合研究，将流动人口的自身原因也加入进去。

(2)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对流动人口生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流动人口作为国家城镇化的重要推力，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问题和家庭保障能力必须得到重视，大多数文献关注于生计脆弱性的形成机制和应对策略，相比较之下忽视了生计可持续性的研究结合进行分析，故而在这方面可持续性与脆弱性没有得到统一的观点论述，这方面的文献可能相对研究较少，本文也利用实证计量方法从定性和定量角度来对流动人口的生计脆弱性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分析，也可以补足这方面文献的不足。

2 概念界定和理论概述

2.1 概念界定

2.1.1 流动人口

我国早期户籍制将大部分劳动力锁定在本地方，后期由于对于劳动力和城镇化进程形成的需要而逐渐的放开户籍制度的锁定，开始允许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这种形式下所造成的流动人口概念与户籍制度是紧密相关的关系，所以目前流动人口的概念是主要运用于我国。而在经济的逐渐发展下，流动人口和社会发展两方相互作用，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使得人口在空间上进行集聚与扩散，同时，流动人口格局经由劳动力空间的优化配置不断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格局（杨成钢和曾永明，2014）。国内学者在对流动人口进行定义时，认为构成流动人口的概念主要有三点：一是不改变户籍地，因此在户籍制度上其自身仍是其他城市的外来人员，二是空间上发生位移，因为务工的需要转向其它地方进行工作，三是在流入地有一段时间的滞留，是一个周期性的时间长度，而非只是短时间的停留。所以从这几个特征出发，本文的研究在对流动人口概念进行界定时，借鉴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的定义，综合考虑户籍、空间、时间和数据来源等方面特征，将流动人口定义为不改变户籍所在地关系，临时离开户籍地到另一个辖区内居住、生活或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时间超过一个月）的18周岁及以上人口。因为学生不涉及生计问题，通常相对于其它流动人口群体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来保障自己，所以本研究的流动人口定义排除学生群体。

2.1.2 生计脆弱性

脆弱性概念早期频繁出现在自然灾害研究领域来衡量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学科间出现相互渗透、交叉的趋势，于是在社会学领域也引入脆弱性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综合性研究，在人口经济学也引申出了生计脆弱性这一概念。目前，生计脆弱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英国国际

发展署（DEID）在其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中对脆弱性做出了解释，脆弱性是家庭和个体的生计受外部冲击、压力、趋势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导致生计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并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二是世界银行对脆弱性做出的解释，脆弱性是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正常水平之下的可能；三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脆弱性做出的定义，一个系统受不利因素影响的敏感度及无法应对这种影响的程度。在风险理论中，对风险最为普遍的定义为“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许汉石和乐章，2012）。”赵锋和杨云彦（2009）将生计风险和生计脆弱性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生计脆弱性一般是指家庭和个体在生计活动过程中，因其生计结构变化或面临外力冲击时所具有的不稳定的易遭受损失的状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的出来，在流动过程中，流动人口家庭生计活动总会面临外部压力的冲击，因而多有波动，同时一般而言流动人口群体的就业能力和自身条件所可以容纳的外部压力冲击的弹性并不是很强，在巨大的压力下事后的恢复能力并不强，经常需要大量的时间来修复，更糟糕的是，恢复能力在面临冲击时很可能直接一次性消耗而无法恢复。因此，本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计风险定义为在谋生过程中所遭受到的外部冲击或者压力，其生计脆弱性则是指外部冲击或者压力和自身的遭遇冲击事后恢复能力所结合形成的结果。

2.2 理论概述

2.2.1 人口迁移理论

（1）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最早用来解释人口流动原因的理论之一，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美国学者 E.S.Lee 提出，并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推拉理论是指劳动力流动是由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人口迁徙。巴格内（D.J Bagne）创新性的提出推拉理论，之后贝斯(Base)、索瓦尼(Sovani)、迈德尔(G.Mydal)等学者都对推拉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他认为，在人口迁出地，存在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常居住地；在人口迁入地，也存在一种起主导作用

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最后，李（Everett. S. Lee）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了迁移理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人口迁移分析框架，补充了影响人口迁移的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包括移民政策、交通情况和语言文化差异等等。伴随着专家学者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多影响因素被纳入其中。例如，舒尔茨（1990）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用于分析迁移和就业，其中人力资本包括个体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收入等，而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能够在城市找到较为体面的工作，获得经济收入来源，为其提供经济基础。

推拉理论是较为全面、且能解释人口流动动因的理论。流动人口作为理性经济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做出迁移决定，在传统推拉理论中，只考虑流出地和流入地，其综合收益为流出地推力加上流入地拉力与二者中间障碍因素之差。当推力远远大于中间障碍因素而成为主导因素时就会发生迁移行为。流动人口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城镇和乡村间流动，既是其进行生计发展的过程，也是拉力和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拉理论是本研究分析人口的流动行为及生计策略的根本出发点，为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提出理论基础。

（2）新经济迁移理论

新经济迁移理论最初由斯塔克（Oded Stark）等（1985）提出，他认为收入差距不是引起人口迁移的唯一动因，并强调家庭因素的重要性，人口迁移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出的迁移决策，并且家庭迁移有利于家庭绝对收入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提出“相对剥夺”概念。总体来说，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认为人们会根据家庭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使迁移和未迁移的家庭成员都获益。它的主要概念可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风险转移。同等市场条件下，家庭收入并不稳定，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可使风险降低，家庭会选择部分成员进行迁移或外出务工。其次是经济约束。由于部分家庭面临资金约束和制度供给的短缺，所以家庭会选择部分成员进行外出务工，以获取维持生计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最后是相对剥夺。斯塔克和伊兹哈基（Oded Stark & Yitzhaki S, 1988）考察了人口迁移与相对剥夺的关系，并认为家庭在做迁移决策时不仅考虑绝对预期收入水平，而且考虑相对于参照人群的收入水平，以此减轻相对剥夺的压力，即使自家的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只要提

高的程度不及参照人群,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感觉并决定迁移。而这种迁移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使得国内的人口流动主要呈现出四个类型的流动方式,即“城-城”流动、“城-乡”流动、“乡-乡”流动和“乡-城”流动。

2.2.2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1) 可持续生计概念的发展

“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能应对胁迫和冲击,并从中恢复、维持和增加资产,保持和提高能力,并且为下一代生存提供机会,在长期和短期内以及在本地区和全球范围内为他人的生计带来净收益,同时又不损坏自然基础,那么该生计便具有可持续性(Chambers & Conway,1992)”。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将“生计”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实现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H)制定《哥本哈根宣言》,将可持续生计概括为“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在这里也可以了解到,可持续生计理论并不是简单的脱离贫困状况,而是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机制改变,共同去消除贫困现象,贫困主体仅凭外力的短期脱贫很容易发生再次贫困的现象而更加难以脱贫,因此主体的能力提高才能取得长期发展,使得发展更加良性。所以在化解流动人口生计风险的问题上,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此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同时对于流动人口群体来说,可持续生计既是生计发展结果,也是生计发展目标。

(2)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建立

国际机构和专家学者在采用可持续生计视角和方法对贫困地区发展项目进行评估时,形成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现有主要可持续分析框架主要有,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2000)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包含五个方面: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制度过程以及组织结构、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寻找主体家庭生计脆弱性原因,给予多

种解决策略，为生计风险的成因与化解提供重要思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援外合作组织（CARE,2000）提出了农户生计安全框架。CARE 认为生计包括能力、资产和某种生活方式所需活动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主体生计策略的制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则是提出可持续生计途径，认为发展的目标是创造让人们可以运用自身能力实现潜能并最终得到发展的环境，并开发出包括投入、产出、成果、影响与过程等一系列的指标，以此对生计安全进行监测。本研究主要使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并借鉴已有研究理论与成果，构建流动人口家庭可持续生计框架，全面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生计现状与风险，为增强流动人口的家庭抗风险能力和生计风险解决策略的制定提供分析方法。

这其中 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最具代表性。与此同时，生计风险作为该框架的核心因素之一，使得这个理论模型框架很好的展示了生计风险的产生原因和其中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导如何预防或减少生计风险。故而本研究基于此框架，将流动人口家庭看作在一个脆弱性的背景中谋生，根据流动人口家庭生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生计风险，充分评估生计风险因素和脆弱性水平，以期帮助其减少因风险带来的损失，提升其自身生计发展能力和家庭抗风险能力，实现有利于可持续的生计结果。

2.2.3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主要是在 Glick(1947)提出的产生、发展、稳定、退化、流出和消失等六个基础阶段上来进行拓展，其主要是指一个家庭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周期性阶段。由于婚姻、年龄和家庭规模及工作状况等因素的到来并作用于家庭，使得家庭环境不断发生演化，进而产生家庭的生命周期。关于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划分，不同学者划分的阶段不完全一样。本文将分别划分为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学（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等四个时期，从而构成一个家庭的生命周期。表明任何一个家庭，都有自己从建立、发展到解体和消亡的过程，其中处于不

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在劳动力供给和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别,周期的变化应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家庭资源配置和家庭效用的变化(Mcauley and Nutty,1982)。由于每个阶段的主要影响不同使得家庭生命周期流动人口的家庭效用也会发生不同的配置方案。吴帆(2012)基于代表性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家庭生命周期的时序结构,其中包括形成至扩展、扩展至稳定和稳定至空巢 3 个阶段,并提出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时序结构划分下,家庭经济结构、家庭资源配置、家庭决策和家庭主体需求都呈现出稳定的特征。

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每个家庭成员的利益得失都跟家庭的发展密切相关。家庭成员间的紧密联系是由婚姻和血缘决定的,家庭依靠这种关系进行组织生产和分工,使家庭内部成员互帮互助和利益共享,以及产生代际间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这种关系的演化贯穿于家庭的不同发展阶段。当家庭经历形成、发展、扩大与衰弱等阶段时,家庭成员根据当期的家庭禀赋和每一阶段的任务要求采取不同的行为选择,家庭生计也随之产生变化。家庭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判断家庭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在该阶段可能面临的生计压力。并根据家庭发展的特殊性,分析家庭的发展现状和现实需求。

家庭发展中的家庭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的四个阶段对于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而言更是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家庭形成期和成长期要求家庭生养子女,如果家庭成员在外进行流动,在流出地的子女得不到家庭的照顾和培养或者在流入地遇到教育资源不公平现象。同时在家庭发展中,流动人口也会面临赡养问题。家庭老人的情感慰藉、生活照料和经济状况都是流动人口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家庭赡养功能在家庭发展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新时代必须积极促进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体系发展,结合政府的政策帮扶,重视流动人口群体在该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增强其家庭照护能力、优化居家社区服务和提升公办机构服务水平等等。

2.3 理论评述

人口迁移是一个多样化、多方面且复杂的现象,人口迁移方面的理论发展为人口流动现象的发生原因从各个角度做出了分析。其中在推拉理论中,人口

流入的最根本原因是流入地拥有特定要素对人口产生显著的“拉力”作用。这些要素包括充足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良好的教育条件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使得迁移群体对未来充满更加良好的预期，故而做出迁移的抉择。与此同时，人口迁移是具有外部性成本的，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很多时候单个人的迁移会面临家庭问题，随着社会发展，顺应着此现实背景下，新经济迁移理论的出现结合家庭因素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家庭因素可以作为一个单位，做出符合自己预期的抉择，人活在未来中，在这样的预期下，面对更好的选择和家庭也会做出迁徙的抉择，该理论对于家庭因素的三个层面的分解确实对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行为做出显著的解释力度，这也更有效于新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动决策的参考。因此，人口迁移理论一方面帮助本研究深入理解流动人口的背景因素，另一方面也帮助本研究划分流动人口的生计模式。

我们在进行了相应的理论阐述后，进一步将其应用于理论框架中，本文选取的生计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主体。可持续生计（DFID）的概念和框架可以针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原因做出一个完整的机理解释，理论的阐述在其中依据相应的要求来进行运作，本文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符合现实下大部分人的迁移框架的背景，很好的模拟了流动群体的脆弱性原因和机制，因此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以使得做出相应的解释后更容易满足现实的变化和需求，同时为生计风险的成因与化解提供重要思路和角度，并给予多种解决策略。因此，本研究以实现流动人口的可持续生计为目标，利用生计理论分析流动人口在生计发展过程中，现存以及潜在的生计风险成因与机制，并为构建和测度家庭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提供参考原则，进而深层次分析解决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在最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对家庭随时间变化进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时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家庭会面临家庭成员的更新、成长、离别、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婚姻和成长所带来的众多因素的进入家庭中来使得大家进行考量，也让家庭出现不断的变化状态之中，流动人口群体面对的这样的周期性变化也使得家庭生计的脆弱性更加的具有波动性，如此之下的生计可持续性也变得更加的复杂，因此我们使用该理论尝试在这个层面来对该问题进行解释。所以我们在研究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风险与脆弱性

的成因与解决策略时，结合家庭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变化进行同步分析。综上所述我们对上述理论的纳入到相应的理论框架中，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在面对生计脆弱性问题时所产生的答案更加完整，也会使得本研究具有理论参考性。

3 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现状和风险分析

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共涵盖169989个流动人口样本，删除不合理和含有空缺的数据，选取数据共计150359个。为了便于分析，部分结果的分析所用数据为调整后的分类，具体调整如下：行业类型中，将“农林牧渔”作为“第一产业”，“采矿”、“制造”、“电煤水热生产供应”及“建筑”归为“第二产业”，其余合并为“第三产业”。此外，连续型变量也做了相应调整：将流动时间划分为“不到1年”、“1-2年”、“3-4年”、“5-9年”、“10-14年”、“15-19年”、“20-19年”和“30年及以上”八类。

3.1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与流动形态

我国人口流动的总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流动人口大多接受初中及以上学历，且从户籍性质看，农业户口和农业转居民户口流动人口的学历水平较低。第二，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处于初婚状态，家庭收入结构显示住房或为最大支出。第三，跨省流动是流动人口的主流，并且跨省流动的家庭倾向于流入浙江省（10.48%）、上海市（8.58%）等经济发达地区。

3.1.1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

（1）流动人口个体特征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总体年龄均值为38.7岁，并且中位数为37、众数为31。总体来说，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是青壮年人群体。从性别比来看，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比例；从学历来看，流动人口总体学历为初中水平的占比最高，比例为44.75%，其余依次是高中（中专）、小学、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未上过学和研究生，流动人口的整体学历呈现较低水平。

表 3.1 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变量统计

| 变量名称 | 变量分类 | 频数 | 占比 (%) | 平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众数 | 中位数 |
|------|--------|--------|--------|-------|-----|-----|----|-----|
| 年龄 | | | | 38.70 | 97 | 18 | 31 | 37 |
| 性别 | 男 | 77034 | 51.23 | | | | | |
| | 女 | 73325 | 48.77 | | | | | |
| 学历 | 未上过学 | 4331 | 2.88 | | | | | |
| | 小学 | 22951 | 15.26 | | | | | |
| | 初中 | 67279 | 44.75 | | | | | |
| 学历 | 高中/中专 | 31689 | 21.08 | | | | | |
| | 大学专科 | 14497 | 9.64 | | | | | |
| | 大学本科 | 8847 | 5.88 | | | | | |
| | 研究生 | 765 | 0.51 | | | | | |
| 户口性质 | 农业 | 117605 | 78.22 | | | | | |
| | 非农业 | 21124 | 14.05 | | | | | |
| | 农业转居民 | 7293 | 4.85 | | | | | |
| | 非农业转居民 | 695 | 0.46 | | | | | |
| | 居民 | 3534 | 2.35 | | | | | |
| | 其他 | 108 | 0.07 | | | | | |
| 政治面貌 | 党员 | 7585 | 5.03 | | | | | |
| | 非党员 | 143231 | 94.97 | | | | | |

学历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实现、就业质量以及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杨铭和王任远，2019；梁海艳，2019；淦宇杰和张龙龙，2021）。从户口性质来看，绝大部分流动人口为农业户口，占据比例为 78.22%，非农业户口仅占比例 14.05%，可见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于农村。结合学历比例来看（如表 3.2），农业和农业转居民户口的流动人口学历水平较低。

表 3.2 不同户口性质与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 (%)

| | 未上过学 | 小学 | 初中 | 高中/中专 | 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 研究生 |
|--------|------|-------|-------|-------|-------|-------|------|
| 农业 | 3.43 | 17.84 | 49.34 | 19.57 | 6.90 | 2.78 | 0.14 |
| 非农业 | 0.69 | 4.04 | 22.87 | 27.37 | 22.31 | 20.47 | 2.24 |
| 农业转居民 | 1.69 | 11.33 | 43.75 | 23.89 | 12.26 | 6.71 | 0.38 |
| 非农业转居民 | 0.72 | 4.46 | 20.43 | 25.32 | 25.90 | 20.58 | 2.59 |
| 居民 | 0.76 | 7.10 | 29.74 | 26.60 | 16.27 | 17.35 | 2.18 |
| 其他 | 0.00 | 5.56 | 34.26 | 32.41 | 13.89 | 12.04 | 1.85 |

（2）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特征

从图 3.1 可知，流动人口家庭初婚占比最高，占比为 89.18%。未婚或同居、

再婚、离婚和丧偶状态占据比例均较低。根据表 3.3 可知，流动人口家庭平均人数为 3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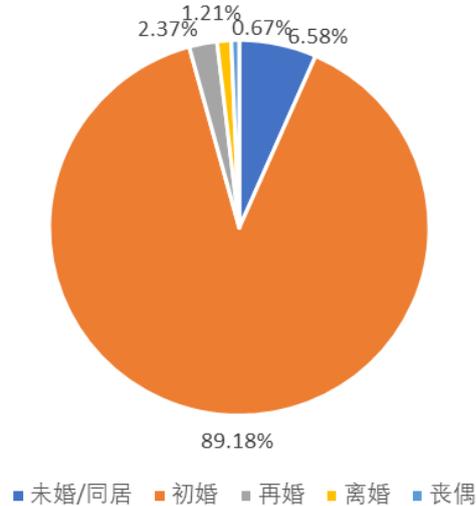


图 3.1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

(3) 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显示（表 3.3），住房或为最大支出，流动人口家庭收入支出比为 2。从表 3.3 可知，流动人口的月住房支出为 861.9 元，占月家庭支出的 22.13%。流动人口的月家庭收入为 7501.95 元，月家庭支出为 3894.22 元，收入大于支出。

表 3.3 流动人口家庭人数与收入结构

| 变量名称 | 平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
| 家庭人数（同住） | 3.41 | 10 | 2 |
| 月住房支出 | 861.9 | 80000 | 0 |
| 月家庭支出 | 3894.22 | 120000 | 70 |
| 月家庭收入 | 7501.95 | 200000 | 0 |

3.1.2 流动形态

流动人口家庭的流动形态包括流动范围、流动原因和流动时间方面的内容。

(1) 流动范围

由图 3.2 可知，流动人口家庭的流动范围的主流是跨省流动，占比为

49.71%。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比例较低，占比依次为 32.51%和 17.74%。可见，近一半流动人口家庭倾向于跨省流动。进一步细分流动范围和流入地可以发现（如图 3.3 所示），跨省流动的家庭较多流入浙江省（10.48%）、上海市（8.58%）、北京市（8.31%）、广东省（6.97%）、江苏省（6.43%）和天津市（6.23%）等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于流出地，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等等，从而不断吸引流动人口家庭的流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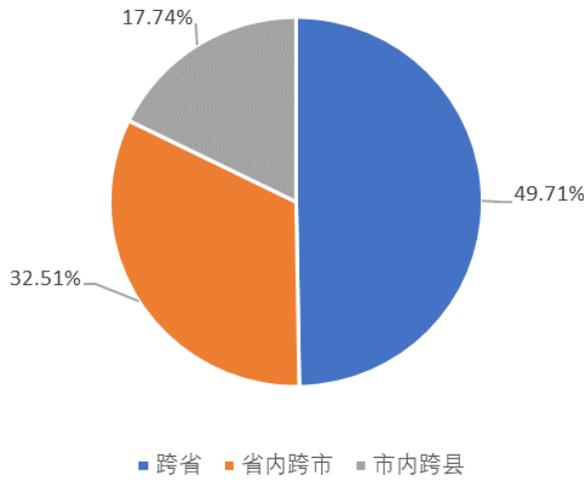


图 3.2 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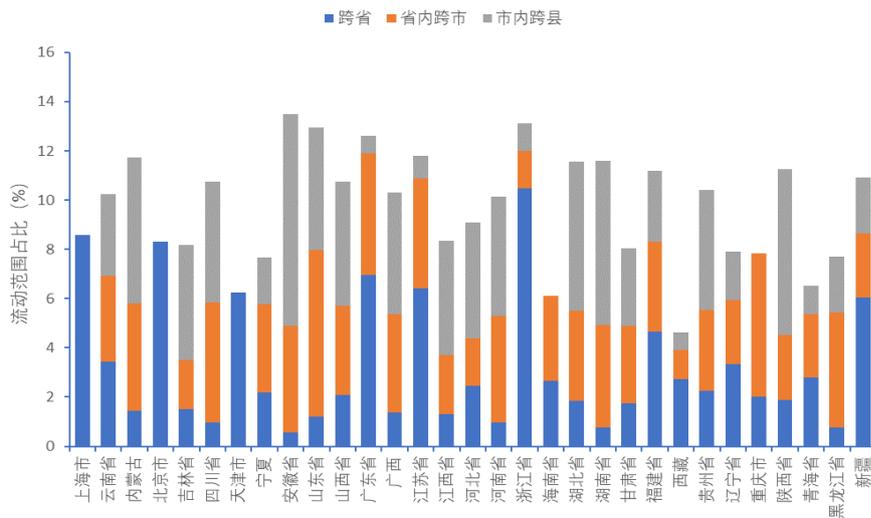


图 3.3 不同流动范围与流入地分布情况

(2) 流动原因

在表 3.4 中可观察出来，流动人口家庭的流动原因以务工（工作）、经商和家属随迁所占比例较高。其中，务工（工作）、经商分别占据整体比例的 57.50%、24.72%。由此可知，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是出于经济因素。另外，家属随迁占据其一定比例（9.47%），这表明人口的流动行为会受到家庭成员流动行为的影响。

表 3.4 流动人口流动原因

| 变量名称 | 变量分类 | 占比 (%) |
|------|--------|--------|
| 流动原因 | 务工/工作 | 57.50 |
| | 经商 | 24.72 |
| | 家属随迁 | 9.47 |
| | 照顾自家老人 | 0.16 |
| | 照顾自家小孩 | 2.56 |
| | 投亲靠友 | 0.78 |
| | 婚姻嫁娶 | 2.73 |
| | 拆迁搬家 | 0.55 |
| | 异地养老 | 0.61 |
| | 出生 | 0.23 |
| | 其他 | 0.69 |

（3）流动时间

从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来看，图 3.4 所示的流动时间的平均值为 6.76 年，并且，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较为集中在 5-9 年、1-2 年和 3-4 年，占据比例分别为 28.16%、23.10%和 16.95%。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流动人口在家庭不同时期下，由于子女上学的较好资源的需求和自身地工作意愿强烈使得流动时间有所上升，然而在年龄的逐渐增大，流动人口选择结婚时婚后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但是工作等方面的需求和收入的较高水平会使得流动群体努力增加自己的居留周期长度，因此可以看出来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家庭化流动对人口流动行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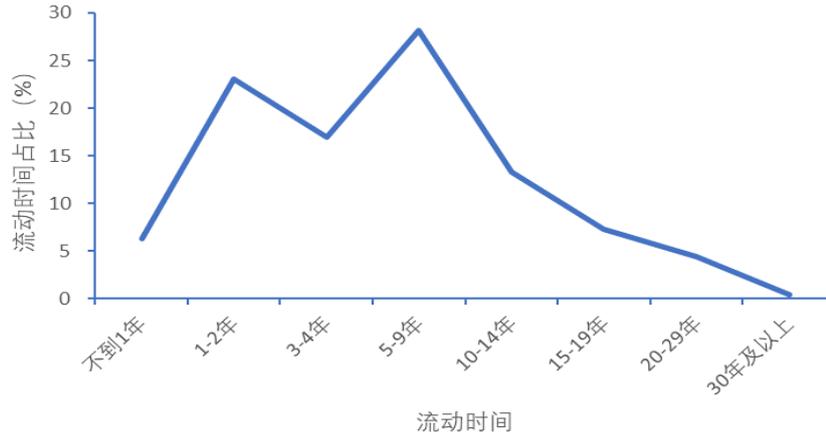


图 3.4 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占比情况

3.2 流动人口家庭就业稳定性、生计模式和生计策略

3.2.1 就业稳定性

本研究关于就业稳定性部分主要借鉴石智雷和朱明宝（2014）的研究成果，分为就业稳定现状和劳动合同性质两部分。就业稳定现状反映的是就业区域的稳定性，指标根据流动人口本地就业时间与外出务工时间的比值划分，比值大于 0.5 的归为稳定就业，小于 0.5 的归为不稳定就业（张丽琼等，2017）。另外，就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和其他的流动人口根据流动时间判断其稳定性。流动时间大于等于 3 年归为稳定就业，小于 3 年归为不稳定就业。其中，本地就业时间使用问卷中“您开始这项工作的年份”或“您开始这份生意的年份”进行计算并测量，外出务工时间使用问卷中“您第一次离开户籍地（县级）的年份”进行计算并测量。选取该指标的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在本地连续务工时间越长，其就业区域的稳定性就越高，就业区域的稳定可以增加其就业稳定的可能；而在本地连续务工的时间短，可能是由于就业地点的频繁更换造成的，这也就意味着更高的职业流动性。

劳动合同性质反映的是就业职业的稳定性，该指标根据流动人口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性质划分。劳动合同性质使用问卷中“您与目前工作单位（雇主）签订何种劳动合同？”测量。选取该指标的原因在于：签订劳动合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具有较大的保障作用。

表 3.5 就业稳定性

| 变量名称 | | 占比 (%) |
|--------|-----------|--------|
| 就业稳定现状 | 不稳定就业 | 43.93 |
| | 稳定就业 | 46.07 |
| | 有固定期限 | 50.48 |
| | 无固定期限 | 12.25 |
| 劳动合同性质 | 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 | 2.18 |
| | 试用期 | 0.73 |
| | 未签订劳动合同 | 33.08 |
| | 不清楚 | 1.27 |

就业稳定性是衡量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如表 3.5 所示，流动人口就业稳定现状中处于不稳定就业、稳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43.93%、46.07%。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差。从劳动合同性质上看，签订有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合同所占比例分别为 50.48%、12.25%，但仍有部分流动人口未签订正式合同，因而不受劳动法保护。总体来看，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较差，失业风险也较大。

3.2.2 生计模式

随着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人们生计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根据上文可知，人口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务工和经商，且 78.22%的流动人口为农业户口。外出务工和经商能有效改善其家庭经济状况、实现家庭发展目标，但是这也改变了流动家庭的收入结构和生计资源配置。为深入理解该变化和分析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模式，本研究根据其承包地处置方式和就业身份，将家庭生计模式划分为半工半耕、半工半租、纯务工型和纯创业型四种生计模式。其中，半工半耕是比较典型的农民工生计模式，它主要有两种组织方式：一是代际分工，二是丈夫或妻子在家务农，另一方在外务工。半工半租则是指农民工收入由租金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组成。半工半耕和半工半租的家庭生计模式能够帮助流动人口家庭保障基本生活、提高家庭收入。表 3.7 中是否有承包地、承包地耕种和就业身份分别由问卷中的“您户籍地老家是否有承包地”、“您家承包地谁在耕种”和“您现在的就业身份”三个指标进行测量。

由表 3.6 可知，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模式以半工半耕和纯务工型为主，占据

比例分别为 35.91%、33.88%，远超纯创业型和半工半租生计模式比例。

表 3.6 生计模式

| 变量 | 变量选取 | 变量描述 | 占比 (%) |
|------|--------|--|--------|
| 半工半耕 | 是否有承包地 | 户籍地老家是否有承包地：有 | 35.91 |
| | 承包地耕种 | 承包地耕种方式：亲朋耕种和自己（家人）耕种 | |
| | 就业身份 | 流动人口目前就业身份：有固定雇主的雇员、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等）、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 | |
| 半工半租 | 是否有承包地 | 户籍地老家是否有承包地：有 | 7 |
| | 承包地耕种 | 承包地耕种方式：转租给村集体、转租给企业和转租给私人 | |
| | 就业身份 | 流动人口目前就业身份：有固定雇主的雇员、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等）、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 | |
| 纯创业型 | 是否有承包地 | 户籍地老家是否有承包地：有、没有、不清楚 | 23.21 |
| | 承包地耕种 | 承包地耕种方式：雇人代耕种、撂荒、种树和其他 | |
| | 就业身份 | 流动人口目前就业身份：雇主和自营劳动者 | |
| 纯务工性 | 是否有承包地 | 户籍地老家是否有承包地：有、没有、不清楚 | 33.88 |
| | 承包地耕种 | 承包地耕种方式：雇人代耕种、撂荒、种树和其他 | |
| | 就业身份 | 流动人口目前就业身份：有固定雇主的雇员、无固定雇主的雇员（零工、散工等）和其他 | |

3.2.3 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是流动人口家庭为了实现生计目标，从而进行的活动和做出的选择。该部分分为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和就业身份与单位性质两个部分。根据杨胜利和王伟荣（2019）的划分标准，我们进而将就业行业部分根据问卷选项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具体行业根据调查问卷中“您现在的工作行业”指标进行测量。

表 3.7 产业分布

| 产业类型 | 具体行业 | 频数 | 占比 (%) | 合计 (%) |
|------|----------|------|--------|--------|
| 第一产业 | 农林牧渔 | 3150 | 2.58 | 2.58 |
| | 采矿 | 1185 | 0.97 | |
| | 电煤水热生产供应 | 606 | 0.5 | |
| | 建筑 | 9953 | 8.17 | |
| 第二产业 | 制造业 | | | 36.07 |
| | 食品加工 | 4563 | 3.74 | |
| | 纺织服装 | 5354 | 4.39 | |
| | 木材家具 | 2044 | 1.68 | |

| | | | | |
|------|----------------|-------|-------|-------|
| | 印刷文体办公娱乐用品 | 1215 | 1 | |
| | 化学制品加工 | 941 | 0.77 | |
| | 医药制造 | 779 | 0.64 | |
| | 专用设备制造 | 1620 | 1.33 | |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 1690 | 1.39 | |
| | 电器机械及制造 | 2450 | 2.01 | |
| | 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制造 | 2605 | 2.14 | |
| | 仪器仪表制造 | 298 | 0.24 | |
| | 其他制造业 | 8667 | 7.1 | |
| | 批发零售 | 27830 | 22.83 | |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 4461 | 3.66 | |
| | 住宿餐饮 | 14844 | 12.18 | |
|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 1691 | 1.39 | |
| | 金融 | 1397 | 1.15 | |
| | 房地产 | 3321 | 2.72 | |
| | 租赁和商务服务 | 497 | 0.41 | |
| | 科研和技术服务 | 383 | 0.31 | |
| 第三产业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 514 | 0.42 | 61.32 |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13116 | 10.76 | |
| | 教育 | 2111 | 1.73 | |
| | 文体和娱乐 | 922 | 0.76 | |
| |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895 | 0.73 | |
| | 国际组织 | 14 | 0.01 | |
| | 卫生 | 1881 | 1.54 | |
| | 社会工作 | 882 | 0.72 | |

流动人口家庭中仍有 2.85 万人处于未就业或失业状态，其余 12.19 万人的就业产业分布、就业身份和单位性质如表 3.7、表 3.8 所示。其中，表 3.8 使用调查问卷中的“您现在的就业身份”、“您现在就业的单位性质”两个指标进行测量。

流动人口就业产业分布不均，其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占据比例 61.3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据比例依次为 36.07%和 2.58%。虽然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分布较多，但大多从事于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如批发零售业（22.83%）、住宿餐饮业（12.18%）和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0.76%）等等。而金融业（1.15%）、文体和娱乐业（0.76%）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1.39%）等高技术含量行业占比低，远远低于在低技术含量行业所占的比例。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占据比例较高，所占比例为 8.17%。究其原因，不少流动人口学历较低，且未能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从而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工作。

表 3.8 就业身份和单位性质占比交叉表 (%)

| 单位性质 | 就业身份 | | | | | 其他 |
|-----------|-------|-------|-------|-------|-------|-------|
| | 雇员 | | 雇主 | 自营劳动者 | 其他 | |
| | 有固定雇主 | 无固定雇主 | | | | |
| 机关、事业单位 | 4.68 | 0.51 | 4.05 | 0 | 0 | 21.87 |
|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 9.32 | 1.9 | 8.2 | 0 | 0 | 8.88 |
| 集体企业 | 1.78 | 0.91 | 1.65 | 0.08 | 0.08 | 1.62 |
| 股份/联营企业 | 7.13 | 1.17 | 6.23 | 0.9 | 0.11 | 1.66 |
| 个体工商户 | 17.28 | 18.04 | 17.39 | 80.62 | 76.21 | 13.35 |
| 私营企业 | 49.69 | 20.38 | 45.28 | 13.65 | 1.48 | 10.75 |
| 港澳台独资企业 | 2.6 | 0.04 | 2.21 | 0 | 0 | 0 |
| 外商独资企业 | 2.66 | 0.14 | 2.28 | 0 | 0 | 0.37 |
| 中外合资企业 | 2.1 | 0.11 | 1.8 | 0.03 | 0.01 | 0.12 |
| 社团/民办组织 | 0.54 | 0.14 | 0.48 | 0.05 | 0.04 | 0.89 |
| 其他 | 1.18 | 6.24 | 1.94 | 0.64 | 1.68 | 18.05 |
| 无单位 | 1.06 | 50.42 | 8.48 | 4.02 | 20.38 | 22.43 |

从单位性质来看，流动人口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占据比例 42.85%。其次是私营企业和无单位，分别占据比例为 26.53%和 12.85%。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联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社团/民办组织以及其他单位总计比例仅为 17.77%。流动人口受制于自身人力资本以及户籍性质，难以进入正式就业部门，只能大量聚集在非正式就业部门，处于一种非正式就业状态。从交叉表 3.8 可知，45.28%的雇员分布于私营企业，17.39%的雇员、80.62%的雇主和 76.21%的自营劳动者分布于个体工商户。这也充分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生计选择以自雇或小规模雇工形式为主。

3.3 流动人口的家庭保障状况

家庭是流动人口获取保障的重要来源。因此对于家庭的保障良好程度，关系到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本部分选取两个指标衡量不同生计模式下流动人口的家庭保障状况——家庭功能完整性和家庭支持能力。家庭功能完整性利用家庭劳动力与本地家庭成员数量的比值计算，家庭劳动力是选取家庭成员中年龄大于等于 18、小于等于 60 的家庭成员数量。家庭支持能力则利用本地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之和与本地家庭成员数量的比值。其中受教育年限是对

学历进行赋值：未上过学为 0、小学为 6、初中为 9、高中/中专为 12、大学专科为 15、大学本科为 16 以及研究生为 19。

由图 3.5 可知，流动人口的家庭功能完整性相差较小。其中，半工半租型流动人口的家庭功能完整性较好，其平均值为 0.75。纯务工型、半工半耕、和纯创业型流动人口的家庭功能完整性平均值依次为 0.73、0.71 和 0.71。同时，家庭功能完整性水平表明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趋势的加强。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不仅追求生计发展，也希望自身能够融入城市。纯务工型流动人口的家庭支持能力较好，平均值为 9.20。半工半租、纯创业型和半工半耕流动人口的家庭支持能力平均值分别为 8.34、8.30 和 8.18。受教育年限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之一，家庭支持能力的好坏往往意味着流动人口家庭就业质量的差距。因此，相对于其他三种生计模式，纯务工型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的就业质量及稳定性较好，也相对的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权益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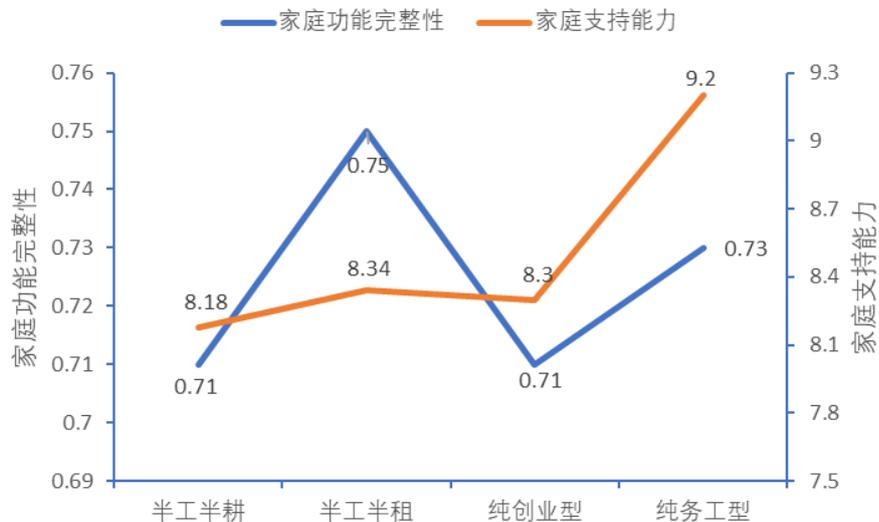


图 3.5 不同生计模式下流动人口的家庭保障状况

3.4 流动人口的家庭住房状况

根据表 3.9 可知，流动人口居住在租赁私房（整租）的占据比例为 46.55%，自购商品房的占据 23.53%，租住私房（合租）等住房所占比例不超过 10%。可

见，流动人口以租赁私房（整租）为主。住房状况可以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感知进而影响到流动人口城市身份认同及其环境行为。（李宝礼等，2019）因此，当前流动人口中自购商品房比例偏低，这也阻碍了其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和市民化进程。

表 3.9 流动人口家庭住房性质

| 变量名称 | 变量分类 | 占比 (%) |
|------|-----------------|--------|
| 住房性质 | 单位/雇主房（不包括就业场所） | 7.14 |
| | 政府提供公租房 | 1.01 |
| | 自购商品房 | 23.53 |
| | 自购保障性住房 | 1.38 |
| | 自购小产权住房 | 2.8 |
| | 借住房 | 1.54 |
| | 就业场所 | 2.60 |
| | 自建房 | 3.94 |
| | 其他非正规居所 | 0.52 |
| | 租住私房-整租 | 46.55 |
| | 租住私房-合租 | 9.01 |

安居乐业是我国的传统思想，因而人们对于住房有较高需求。但是，流动人口往往存在着家庭住房风险。首先，流动人口的家庭住房水平低，具体表现为住房的难获得性。大部分流动人口认为自购住房是居留城市的必要条件，但是其住房需求难以满足。流动人口家庭住房获取途径以租房为主。根据数据统计，流动人口中通过租住私房获得住房的占据 55.56%，通过自购房获得住房的仅占 27.71%。其中，流动人口住房难获得性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的限制。由上文可知，流动人口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城市。但发达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较高，很大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发展带来了阻碍。

有学者通过电/液化汽、自来水、住房用途、洗澡设施等指标构建住房质量指数，以计算分析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通过计算得出流动人口的平均住房质量指数为 0.55（满分为 1.0）。并以泉州市为例，流动人口的住房质量指数为 0.56，当地居民的住房质量指数为 0.7。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的家庭住房质量与当地居民存在显著差距，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居住条件较差和居住质量低等问题。

3.5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参保率和社会保障待遇两方面。对于社会保险参保率，本研究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图 3.6 显示，流动人口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率最高，为 64.3%。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与率为 20.71%，参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与率为 7.08%，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与率为 4.79%。公费医疗的参与率最低，仅为 2.11%。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率不高，未能在流动人口群体实现全覆盖，且存在部分流动人口未参与以上五种保险（7.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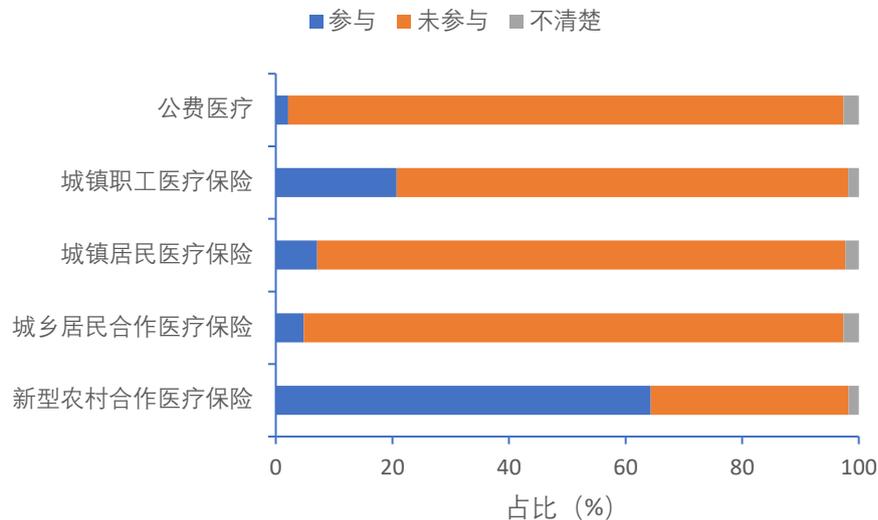


图 3.6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情况

3.6 流动人口家庭生计可持续困境

3.6.1 社会保障不完善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主要受到以下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就业状况。在新时代，流动人口群体中出现了众多新业态就业者，由此产生社会保险、职业保险等劳动权益保障受损等问题，这也对社会权益保障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二

是户口性质。流动人口户口性质带来的诸如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问题，使得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更加复杂。此外，社会保险的属地化管理，造成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供给、医疗报销的衔接手续繁琐和成本增加等问题。三是劳动合同性质。签订劳动合同是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劳动合同中也规定了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相关条款（贾洪波，2021）。因而，流动人口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合同性质也会影响社会保障参与情况以及合法权益维护状况。据上文统计，仍有部分流动人口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从而游离于劳动法保护之外，其自身的社会保障参与情况也不理想。

流动人口参保水平差距大（表 3.10），乡一城流动人口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参与水平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和社会保险参与水平低，使其在流入地公共服务可及性的降低，也导致健康风险的显著提高。

表 3.10 流动人口参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现状（%）

| | 养老 | 医疗 | 工伤 | 失业 | 生育 | 五种全部参加 |
|-----|-------|-------|-------|-------|-------|--------|
| 乡一城 | 14.95 | 14.01 | 16.42 | 11.59 | 8.58 | 6.02 |
| 城一城 | 46.2 | 44.56 | 36.24 | 36.91 | 26.6 | 20.78 |
| 合计 | 19.62 | 18.57 | 19.38 | 15.38 | 11.28 | 8.22 |

资料来源：陶树果,高向东,方中书.乡一城、城一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基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西北人口,2018,39(02):88-95.

3.6.2 就业质量提升受限

根据上文统计，流动人口学历以初中水平为主，占据比例达到 44.76%，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总计占比仅为 6.38%。流动人口的学历水平偏低，且未接受过专业的工作技能培训，只能从事于建筑业、运输业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工作岗位缺乏竞争力和生计发展空间，工作强度大且收入水平较低，并不利于该群体的生计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刺激着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就业需求的多样化发展。但是，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学历水平和职业技能并不能满足新的就业需要，甚至没有机会获取新时期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极易使其陷入失业风险。因而，进入新时代，流动人口群体的生计发展亟需我们的重视。

本研究在数据统计的过程中发现，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存在其家庭主要劳动

者的年龄超过 60 岁的现象。此类群体的学历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7.21，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比高达 84.17%，且绝大部分就业于第三产业的低端服务业，该行业主要特点为收入水平低，工作环境差以及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该群体在应退休的年龄段，仍从事于低端服务业，可见其经济基础薄弱，抵御风险能力差。

3.6.3 家庭赡养功能减弱

随着家庭化流动趋势的发展，带来了家庭养老问题。人们为了生计发展的需求，离开流出地，导致无法日常照料家中老人，从而导致产生了大量留守老人，使得家庭赡养功能逐渐减弱，同时有 71.26%的流动人口反映自家有老人赡养的困难。根据上文可知，赡养功能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感慰藉。长期的代际生活空间分离，使得留守老人的情感支撑能力不断弱化，并产生孤独感和缺乏安全感，最终造成其精神上的空虚和负担。二是生活照料。地理间隔让子女亲自照料老人变得不现实。一旦留守老人生病或生活难以自理，其子女生计发展也将受到影响，甚至不得不放弃当前生计策略。三是经济支持。根据“六普”数据，59.31%农村老人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加大了流动人口的经济压力，也对家庭整体的生计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新时代，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无疑进一步加重了流动人口家庭的养老风险。

4 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测量与影响因素分析

4.1 变量选取与解释

在上文的描述性分析之下，我们进一步地将相应的数据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性三个方面来进行回归分析，其作为我们的被解释变量分别在各自的角度分解了生计脆弱性问题，进而更好的衡量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问题。

因此本部分选用来源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问卷调查的数据，鉴于研究对象为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抽取其中“同住的家庭其他成员数”为 2 或大于 2 的流动人口样本数据；抽取被访者为“本人”且“出生年份在 2000 年及 2000 年之后”的流动人口样本数据；并删除不合理和含有空缺的数据，最终选取数据共计 150359 个。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流动人口在各方面的差异，根据表 4.1、4.2、4.3 进行赋值处理。问卷中部分变量为定性变量和虚拟变量。定性变量利用主观赋值法对该部分数据进行赋值，该方法是基于指标评价程度进行的主观赋值。虚拟变量则利用赋值进行区分。

因变量选取：本研究设立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实证计量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家庭化流动特征对其生计脆弱性的影响。选取生计脆弱性（F）、暴露度（R）、适应性（D）和敏感度（S）作为因变量。

自变量选取：家庭功能完整性和家庭支持能力能够较好的反映出流动人口的家庭保障状况，本地家庭成员数量能够反映出流动家庭的规模和家庭类型，外出务工时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家庭的居留意愿，家庭老龄化程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家庭养老压力和劳动力比例大小，户主（受访者默认为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能够反映出其就业质量和稳定性，户主年龄则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选取家庭功能完整性（ X_1 ）、家庭支持能力（ X_2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 X_3 ）、外出务工时间（ X_4 ）、家庭老龄化程度（ X_5 ）、户主受教育程度（ X_6 ）和户主年龄（ X_7 ）作为自变量。

4.2 生计脆弱性指标构建与测量

4.2.1 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

人口的流动行为会对家庭生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家庭化流动又将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产生什么影响呢？为理清二者之间具体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首先将生计脆弱性进行量化处理。为此，本章从生计脆弱性的概念界定出发，将生计脆弱性分解为三个层次，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1) 暴露度

生计脆弱性的第一准则层为暴露度。生计脆弱性的前提是流动人口在进行家庭生计过程中遭受的各种不利因素。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社会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和就业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流动人口家庭的暴露度。其原因在于，家庭成员处于不健康状况会除了引发自身健康风险之外，也将导致家庭支出的增加，从而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而社会医疗保险就能够有效规避风险，如果流动人口未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其更容易暴露在因疾病导致的家庭开支大幅增长的风险中；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可持续发展，如果流动人口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或者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其面临的失业风险就更容易暴露。

暴露度由被访问人健康状况、社会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和就业稳定性三部分组成。被访问人健康状况选取问卷中的“您的健康状况”指标，并将选项中“健康”赋值为 1，“基本健康”赋值为 2，“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赋值为 3，“生活不能自理”赋值为 4。社会医疗保险参与情况整合问卷中的“您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您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您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您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您是否参加公费医疗”五个指标，五个指标选项中参与至少一种及一种以上的社会医疗保险视为“是”，赋值为 1，五个指标选项中全部选择未参与或不清楚则视为“否”，赋值为 2。就业稳定性可以细分为就业稳定现状和劳动合同性质。就业稳定性将上文就业稳定性中的数据进一步整理，其中就业稳定现状选取“就

业稳定率”，并将“就业稳定”赋值为1，“不稳定就业”赋值为2。劳动合同性质将选项中“有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归为“签订正式合同”，赋值为1，“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试用期”、“未签订正式合同”和“不清楚”归为“未签订正式合同”，赋值为2。各因素的具体情况见表4.1所示：

表 4.1 暴露度因素

| 指标名称 | 符号 | 指标内涵 | 赋值说明 |
|------------|----|------------|-----------------------------------|
| 被访问人健康状况 | R1 | 健康状况自评 | 1=健康；2=基本健康；3=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4=生活不能自理 |
| 社会医疗保险参与情况 | R2 | 是否参与社会医疗保险 | 1=是，2=否 |
| 就业稳定性 | R3 | 流动人口就业是否稳定 | 1=就业稳定；2=不稳定就业 |
| 劳动合同性质 | R4 | 是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 1=签订正式劳动合同；2=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

(2) 敏感度

生计脆弱性的第二准则层为敏感度。不同家庭类型对于相同风险的敏感度不同，风险对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产生的后果也就不同。敏感度是家庭主体面对外界风险冲击时表现出的一种敏感程度，通常反映在遭受冲击后家庭某方面发生变化或者形成趋势，甚至处于另一种境况，但这种变化、趋势及状态一般是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不利的。本研究基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风险冲击可能出现的敏感特征，将流动人口家庭敏感度的衡量因子分为以下方面：一是流入地困难和流出地困难。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进行生产生活，必然会在流入地或流出地遇到各种困难。困难越多将导致暴露度越大；二是被访问者的主观融入度评判，包括流入地喜欢程度、关注程度、自我融入意愿程度等。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入度一方面体现了流入地的开放包容程度和流入地居民的接纳程度（肖宝玉等，2021），另一方面体现了流动人口自身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以及获取流入地资源的能力（张学浪和笪晨，2020）。因此，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入度越低，流动人口拥有扩展话语表达的渠道或机会就越少、社会参与意识越弱。也即当流动家庭主体在面对诸如市民化风险等风险冲击时，其主观融入度越低，越难获取利益诉求的渠道，敏感度也越高。

流动人口的家庭敏感度因素分为客观困难情况和主观融入度评判。客观困难情况可以细分为流入地困难和流出地困难。流入地困难选取问卷中“目前在本地，您家有没有困难”，选项“没有”赋值为 1，选项“有”赋值为 2；流出地困难选取问卷中“目前在您老家，您家有没有困难”，选项“没有”赋值为 1，选项“有”赋值为 2。主观融入度评判可以细分为流入地喜欢程度、流入地关注程度、自我融入意愿程度、本地人接受程度、本地人歧视程度和自我认同程度六个指标。流入地喜欢程度选取问卷中“是否同意‘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这个说法”，选项“完全同意”赋值为 1，“基本同意”赋值为 2，“不同意”赋值为 3，“完全不同意”赋值为 4；流入地关注程度选取“是否同意‘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这个说法”，选项“完全同意”赋值为 1，“基本同意”赋值为 2，“不同意”赋值为 3，“完全不同意”赋值为 4；自我融入意愿程度选取“是否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这个说法”，选项“完全同意”赋值为 1，“基本同意”赋值为 2，“不同意”赋值为 3，“完全不同意”赋值为 4；本地人接受程度选取“是否同意‘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这个说法”，选项“完全同意”赋值为 1，“基本同意”赋值为 2，“不同意”赋值为 3，“完全不同意”赋值为 4；本地人歧视程度选取“是否同意‘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这个说法”，选项“完全不同意”赋值为 1，“不同意”赋值为 2，“同意”赋值为 3，“完全同意”赋值为 4；自我认同程度选取“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选项“完全同意”赋值为 1，“基本同意”赋值为 2，“不同意”赋值为 3，“完全不同意”赋值为 4。具体情况见表 4.2:

表 4.2 敏感度因素

| 指标名称 | 符号 | 指标内涵 | 赋值说明 |
|---------|----|------------------|-----------------------------|
| 流入地困难 | S1 | 流入地有没有困难 | 1=没有；2=有 |
| 流出地困难 | S2 | 流出地有没有困难 | 1=没有；2=有 |
| 流入地喜欢程度 | S3 | 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 | 1=完全同意；2=基本同意；3=不同意；4=完全不同意 |
| 流入地关注程度 | S4 | 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 | 1=完全同意；2=基本同意；3=不同意；4=完全不同意 |

续表 4.2 敏感度因素

| 指标名称 | 符号 | 指标内涵 | 赋值说明 |
|----------|----|--------------------|-----------------------------|
| 自我融入意愿程度 | S5 | 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 | 1=完全同意；2=基本同意；3=不同意；4=完全不同意 |
| 本地人接受程度 | S6 | 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 | 1=完全同意；2=基本同意；3=不同意；4=完全不同意 |
| 本地人歧视程度 | S7 | 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 | 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同意；4=完全同意 |
| 自我认同程度 | S8 | 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 | 1=完全同意；2=基本同意；3=不同意；4=完全不同意 |

(3) 适应性

生计脆弱性的第三准则层为适应性。一旦风险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造成不良后果，流动人口家庭可以凭借其已有资本抵御风险冲击、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这体现出流动人口家庭对风险冲击的适应性。本研究依据流动人口家庭的主要特点及实际情况，将适应性分为生计资本和社会保障与服务两个方面。其中，生计资本分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从中我们进一步选取关于流动人口家庭的适应性因素。

适应性分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与服务五个方面。流动人口家庭的物质资本选取其家庭住房性质，选取问卷“您现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指标。为了方便统计，将选项中“自购商品房”、“自购保障性住房”、“自购小产权住房”和“自建房归为自购/自建住房”，赋值为 1；“政府提供公租房”、“租住私房-整租”、“租住私房-合租”归为“租房”，赋值为 2；“单位/雇主房（不包括就业场所）”、“借住房”、“就业场所”和“其他非正规居所”归为“其他”，赋值为 3。金融资本为家庭平均每月结余，利用“家庭平均每月总收入”与“家庭平均每月总支出”的差值得出。社会资本为流动人口家庭的本地往来情况，选取问卷“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及其他亲属）”指标。并将选项中“同乡（户口迁至本地）”、“同乡（户口仍在老家）”和“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与老家以来的其他地区）”归为“同乡”，并赋值为 1，“其他本地人”赋值为 2，“其他外地人”赋值为 3，“很少与人来往”赋值为 4。人力资本采用的是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指的是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家庭劳动力数

量选取问卷中 18 至 60 岁的同住家庭成员数量。将家庭中无劳动力数量赋值为 1，家庭成员中有 1 人为劳动力赋值为 2，家庭成员中有 2 人为劳动力赋值为 3，家庭成员中有 3 人为劳动力赋值为 4，家庭成员中有 4 人及以上为劳动力赋值为 5。社会保障和服务分为个人保障卡和居住证/暂住证。个人保障卡选取问卷“您是否办理过个人社会保障卡”指标。将选项“没办，没听说过”、“没办，但听说过”和“不清楚”归为未办理，赋值为 1；将“已经办理”归为已办理赋值为 2。居住证/暂住证选取问卷“您是否办理了暂住证/居住证”。将“否”、“不清楚”和“不适合”归为未办理，赋值为 1；“是”归为已办理，赋值为 2。

表 4.3 适应性因素

| 指标分类 | 指标名称 | 符号 | 指标内涵 | 赋值说明 |
|---------|----------|----|---------------------------|--|
| 物质资本 | 住房性质 | A1 | 现住房属于何种性质 | 1=自购/自建住房；2=租房；3=其他 |
| 金融资本 | 家庭平均每月结余 | A2 | 家庭平均每月总收入与家庭平均每月总支出的差值 | 1=0 及以下；2=0-2000；3=2000-5000；4=5000-10000；5=10000 以上 |
| 社会资本 | 本地往来 | A3 | 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及其他亲属） | 1=同乡；2=其他本地人；3=其他外地人；4=很少与人来往 |
| 人力资本 | 家庭劳动力数量 | A4 | 家庭成员中劳动力数量 | 1=0 人；2=1 人；3=2 人；4=3 人；5=4 人及以上 |
| 社会保障与服务 | 个人保障卡 | A5 | 是否办理了个人保障卡 | 1=未办理；2=已办理 |
| | 居住证/暂住证 | A6 | 是否办理了居住证/暂住证 | 1=未办理；2=已办理 |

4.2.2 生计脆弱性测算

(1)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去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数据无量纲化处理主要解决数据的可比性，在数据分析之前，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数值代表的含义不同，对此，本研究使用不同的算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其具体方法如下：

$$\text{正向指标: } Z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j) - \min(X_j)} \quad (4-1)$$

$$\text{负向指标: } Z_{ij} = \frac{\max(X_j) - X_{ij}}{\max(X_j) - \min(X_j)} \quad (4-2)$$

其中, Z_{ij} 为标准化后第 i 个样本的第 j 个指标的数值, $i=12 \cdots m$; $j=12 \cdots n$ 。

(2) 因子权重确定

熵值法是一个非人为赋权的方法, 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响来决定指标的权重, 能够较好地克服多指标变量间的信息重叠和指标权重的主观性, 避免人为等因素的干涉, 使得计算的指标权重值具有客观性和较高的可信度。本研究选用熵值法确定权重, 根据生计脆弱性所包含的三大部分, 对每部分分别进行权重的确定。并利用生计脆弱性量化公式得到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值。

生计脆弱性的量化参考 Hahn (2009) 的生计脆弱性评估方法, 该评估方法能够反映特定脆弱性中微妙但关键的差异, 有利于将生计脆弱性进行比较。因此, 文章将生计脆弱性程度 (F) 定量表示为:

$$F = (R - D) \times S \quad (4-3)$$

其中, F 为生计脆弱性, R 为暴露度, D 为适应性, S 为敏感度。生计脆弱性值越大, 脆弱性程度越高。

各指标权重如下:

$$R = 0.0081R_1 + 0.0663R_2 + 0.3492R_3 + 0.5763R_4 \quad (4-4)$$

$$S = 0.4995S_1 + 0.3109S_2 + 0.0194S_3 + 0.0222S_4 + 0.0253S_5 + 0.0255S_6 + 0.0451S_7 + 0.0522S_8 \quad (4-5)$$

$$D = 0.1667A_1 + 0.1667A_2 + 0.1667A_3 + 0.1667A_4 + 0.1666A_5 + 0.1667A_6 \quad (4-6)$$

(3) 生计脆弱性统计结果

上文利用熵值法对暴露度、敏感度、适应度以及生计脆弱性指数进行了综合计算, 为了解数据集各变量的数值大小发布情况, 对暴露度, 敏感度, 适应度以及生计脆弱性, 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下:

表 4.4 生计脆弱性统计

| 变量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R | 0.358 | 0.315 | 0 | 0.967 |
| S | 0.534 | 0.35 | 0 | 1 |
| D | 0.524 | 0.157 | 0 | 1 |
| F | -0.085 | 0.223 | -0.959 | 0.883 |

结果显示，暴露度（R）的均值为 0.358，说明暴露度整体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标准差为 0.315，最大值为 0.967，最小值为 0，从极值和标准差上来看说明不同家庭之间暴露度的差异性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家庭暴露度的不均衡形态。敏感度（S）的均值为 0.534，说明暴露度整体处于偏高的水平，从极值和标准差上来看说明不同家庭之间敏感度的差异性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家庭敏感度的不均衡形态。适应度（D）的均值为 0.524，说明暴露度整体处于中等的水平，标准差为 0.157，说明不同家庭之间适应度的差异性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家庭适应度的较为均衡。生计脆弱性（F）的均值为-0.085，说明生计脆弱性指数整体处于中等的水平，标准差为 0.223，从极值和标准差上来看说明不同家庭之间生计脆弱性的差异性极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不均衡状态。

（4）不同生计模式下家庭生计脆弱性比较

依据公式（4-4）到（4-6），可定量得出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及其包含的风险暴露程度，敏感度和风险适应性的大小。通过生计脆弱性量化公式： $F = (R - D) \times S$ ，所得到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平均值为-0.0853。因此，低于此值的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脆弱性较高（以下称之为高脆弱性），共占据其整体比例 39.47%。高于该数值的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脆弱性低（以下称之为低脆弱性），共占据其整体比例 6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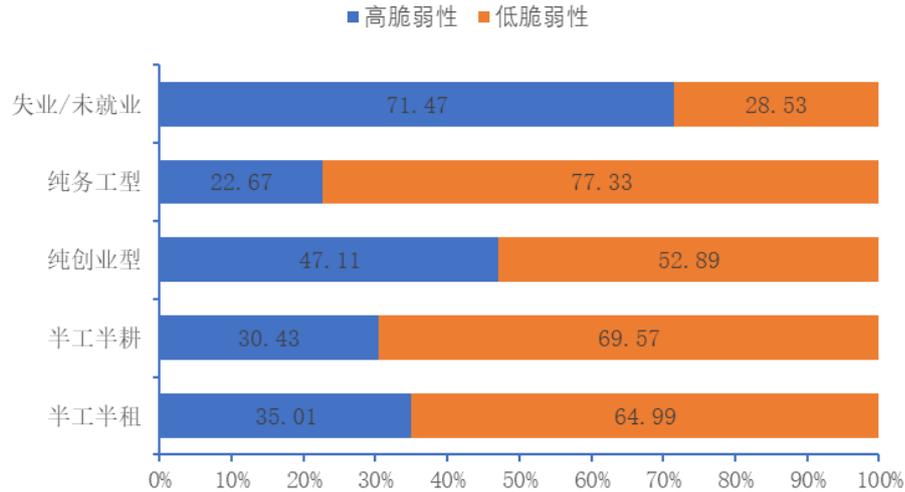


图 4.1 不同生计模式下生计脆弱性对比 (%)

由图 4.1 可知，半工半租、半工半耕、纯创业型和纯务工型流动人口家庭在低脆弱型数据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尤其是纯务工型流动人口家庭，77.33%的纯务工型流动人口分布在低脆弱性生计中。其次是半工半耕和半工半租型流动人口，分别有 69.57%和 64.99%流动人口占据其中。失业/未就业流动人口则体现出较高的脆弱性，仅有 28.53%分布在低脆弱性生计中。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失业/未就业流动人口分布在高脆弱性生计。接近一半的纯创业型流动人口分布于高脆弱性生计中，这也体现出非正式就业的不稳定性。其余依次是半工半租、半工半耕和纯务工型流动人口，分别占比 35.01%、30.43%和 22.67%。

4.3 模型设定和检验

4.3.1 模型设定

第一，估计流动人口的家庭化流动特征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第二，估计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影响；第三，分析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线性回归模型是研究变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一种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因变量与其他多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本研究将构建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对以上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将家庭功能完整性、家庭支持能力、本地家庭成员数量、外出务工时间、家庭老龄化程度、户主受

教育程度和户主年龄分别设为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 X_6 和 X_7 ，并建立四个回归模型结构如下：

$$F = \alpha_0 + \alpha_1 X_1 + \alpha_2 X_2 + \alpha_3 X_3 + \alpha_4 X_4 + \alpha_5 X_5 + \alpha_6 X_6 + \alpha_7 X_7 + \epsilon_1 \quad (4-7)$$

$$R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6 X_6 + \beta_7 X_7 + \epsilon_2 \quad (4-8)$$

$$S = \gamma_0 + \gamma_1 X_1 + \gamma_2 X_2 + \gamma_3 X_3 + \gamma_4 X_4 + \gamma_5 X_5 + \gamma_6 X_6 + \gamma_7 X_7 + \epsilon_3 \quad (4-9)$$

$$D = \delta_0 + \delta_1 X_1 + \delta_2 X_2 + \delta_3 X_3 + \delta_4 X_4 + \delta_5 X_5 + \delta_6 X_6 + \delta_7 X_7 + \epsilon_4 \quad (4-10)$$

其中F、R、S和D为被解释变量，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 X_6 和 X_7 为解释变量， α_0 、 β_0 、 γ_0 和 δ_0 为常数项， $\alpha_1 - \alpha_7$ 、 $\beta_1 - \beta_7$ 、 $\gamma_1 - \gamma_7$ 、 $\delta_1 - \delta_7$ 为待估计参数， ϵ 为误差项。

4.3.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衡量两个变量时间相关密切程度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模型估计的前提，如果相关性结果显示因变量和各自变量之间没有关系，则表示模型所选取的指标存在问题，或者说自变量选取的不合适，需要剔除。同时，相关性分析还可以查看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何，从而判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也是判断自变量选取合理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为观察因变量和自变量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程度如何，利用 stata 14.0 软件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4.5 所示。

结果显示，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而各自变量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相关，因此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作用，变量可以进行相关性系数和显著性系数的描述。

表 4.5 相关性检验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
| (1)F | 1.000 | | | | | | | | | | |
| (2)R | 0.716 (0.000) | 1.000 | | | | | | | | | |
| (3)S | -0.230 (0.000) | 0.073 (0.000) | 1.000 | | | | | | | | |
| (4)D | -0.262 (0.000) | 0.180 (0.000) | 0.084 (0.000) | 1.000 | | | | | | | |
| (5)X ₁ | -0.042 (0.000) | 0.009 (0.034) | -0.018 (0.000) | 0.153 (0.000) | 1.000 | | | | | | |
| (6)X ₂ | 0.052 (0.000) | 0.179 (0.000) | 0.108 (0.000) | 0.169 (0.000) | 0.248 (0.000) | 1.000 | | | | | |
| (7)X ₃ | -0.062 (0.000) | -0.051 (0.000) | -0.107 (0.000) | 0.130 (0.000) | 0.018 (0.000) | -0.288 (0.000) | 1.000 | | | | |
| (8)X ₄ | -0.067 (0.000) | -0.054 (0.000) | -0.112 (0.000) | 0.120 (0.000) | 0.188 (0.000) | -0.011 (0.001) | 0.098 (0.000) | 1.000 | | | |
| (9)X ₅ | 0.083 (0.000) | 0.093 (0.000) | -0.054 (0.000) | 0.069 (0.000) | 0.217 (0.000) | 0.057 (0.000) | -0.017 (0.000) | -0.064 (0.000) | 1.000 | | |
| (10)X ₆ | 0.078 (0.000) | 0.234 (0.000) | 0.128 (0.000) | 0.191 (0.000) | -0.125 (0.000) | 0.545 (0.000) | -0.116 (0.000) | -0.125 (0.000) | 0.087 (0.000) | 1.000 | |
| (11)X ₇ | -0.068 (0.000) | -0.088 (0.000) | -0.029 (0.000) | -0.026 (0.000) | 0.186 (0.000) | 0.020 (0.000) | -0.056 (0.000) | 0.331 (0.000) | -0.425 (0.000) | -0.362 (0.000) | 1.000 |

4.3.3 模型检验

根据相关性检验可知，各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为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对各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

(1) 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4.6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VIF | 1/VIF |
|----------|-------|-------|
| X_6 | 1.932 | 0.518 |
| X_2 | 1.916 | 0.522 |
| X_7 | 1.769 | 0.565 |
| X_5 | 1.389 | 0.72 |
| X_1 | 1.35 | 0.741 |
| X_4 | 1.168 | 0.856 |
| X_3 | 1.129 | 0.886 |
| VIF Mean | 1.522 | |

检验结果如表 4.6 所示，其结果显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 异方差性检验

利用怀特异方差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text{chi2}(35)=259.71$$

$$\text{Prob}>\text{chi2}=0.0000$$

结果显示，不存在异方差性。

4.4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回归分析

(1)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模型 1 的因变量为生计脆弱性，由表 4.7 可知，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家庭功能完整性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回归系数为负，显著性 $p<0.01$ ，说明家庭功能完整性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有着积极影响，

家庭功能完整性越好说明家庭中劳动力比例越高，家庭负担小，因而可以显著降低其生计脆弱性指数；家庭支持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显著性 $p < 0.01$ ，说明家庭支持能力增加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虽然家庭支持能力越好说明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但是从上文可知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学历较低，这也就意味着家庭中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且处于上学状态。因此家庭支持能力越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增加家庭生计脆弱性；本地家庭成员数量的回归系数为负，显著性 $p < 0.01$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越多，意味着家庭在流入地能获取更好的情感支撑和社会融入感，因此本地家庭成员越多会显著削弱其生计脆弱性指数。外出务工时间对家庭生计脆弱性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显著性 $p < 0.01$ ，这说明外出务工时间的越长，越有机会积累工作经验和掌握工作技能，进而降低生计脆弱性指数。家庭老龄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显著性 $p < 0.01$ 。家庭老龄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家庭的养老负担越重，从而加重生计脆弱性。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是仍需要结合后面模型进行分析。户主年龄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性 $p < 0.05$ 。这说明户主年龄越大，需要面临自身养老和收入减少等问题，因此加重了家庭生计脆弱性指数。以上说明在家庭完整性，个体的学历水平和家庭人数都有相应的影响传到作用方向，对于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赡养功能也有相关作用。

表 4.7 模型 1 结果

| 自变量 | 变量含义 | 系数 |
|-------|----------|----------------------|
| X_1 | 家庭功能完整性 | -0.051*** (0.003) |
| X_2 | 家庭支持能力 | 0.026*** (0.004) |
| X_3 |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 | -0.078*** (0.005) |
| X_4 | 外出务工时间 | -0.089*** (0.006) |
| X_5 | 家庭老龄化程度 | 0.157*** (0.005) |
| X_6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053*** (0.004) |

| | | |
|----------|------|----------------------|
| X_7 | 户主年龄 | 0.011* (0.006) |
| Constant | 常数 | -0.228*** (0.006) |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 2 的因变量为暴露度，由表 4.8 可知，因变量与自变量存在显著的关系。家庭功能完整性与本地家庭成员数量均不显著，考虑到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因此在后文对模型做出调整与优化。本地家庭成员数量对暴露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本地家庭成员数量对流动人口家庭暴露度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时间对暴露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性 $p < 0.01$ ，说明外出务工时间越长，暴露度越低。家庭老龄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显著性 $p < 0.01$ 。家庭老龄化程度对暴露度有着负面影响，家庭老龄化程度越高，暴露度越高。户主年龄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性 $p < 0.01$ 。这说明户主年龄越大，家庭的赡养功能方面的要求越高，因此其暴露度越高。

表 4.8 模型 2 结果

| 自变量 | 变量含义 | 系数 |
|----------|----------|----------------------|
| X_1 | 家庭功能完整性 | 0.001 (0.004) |
| X_2 | 家庭支持能力 | 0.102*** (0.005) |
| X_3 |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 | -0.008 (0.007) |
| X_4 | 外出务工时间 | -0.094*** (0.008) |
| X_5 | 家庭老龄化程度 | 0.203*** (0.007) |
| X_6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345*** (0.006) |
| X_7 | 户主年龄 | 0.062** (0.008) |
| Constant | 常数 | -0.061*** (0.009) |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 3 的因变量为敏感度，由表 4.9 可知，因变量与自变量存在显著的关系。家庭功能完整性、家庭支持能力、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敏感度呈现正向的

影响，且除户主年龄之外，其他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本地家庭成员数量、外出务工时间和家庭老龄化程度呈现负向的影响。这说明当家庭功能完整性、家庭支持能力、家庭老龄化程度、户主受教育程度越大时，敏感度越高，而户主年龄对敏感度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家庭成员数量、外出务工时间和家庭老龄化程度会降低敏感度，从而家庭的生计脆弱性也有所降低。

表 4.9 模型 3 结果

| 自变量 | 变量含义 | 系数 |
|----------|----------|----------------------|
| X_1 | 家庭功能完整性 | 0.038*** (0.004) |
| X_2 | 家庭支持能力 | 0.047*** (0.006) |
| X_3 |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 | -0.225*** (0.008) |
| X_4 | 外出务工时间 | -0.327*** (0.009) |
| X_5 | 家庭老龄化程度 | -0.217*** (0.008) |
| X_6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197*** (0.007) |
| X_7 | 户主年龄 | -0.007 (0.009) |
| Constant | 常数 | 0.699*** (0.010) |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 4 的因变量为适应性，由表 4.10 可知，因变量与自变量存在显著的关系。家庭功能完整性、家庭支持能力、外出务工时间、家庭老龄化程度、本地家庭成员、户主年龄对流动人口家庭适应性的影响回归系数均为正，显著性 $p < 0.01$ ，说明各变量对适应性有积极影响，变量值越大，对流入地存在的适应性越强，可以显著增加其适应性指数。

表 4.10 模型 4 结果

| 自变量 | 变量含义 | 系数 |
|-------|---------|---------------------|
| X_1 | 家庭功能完整性 | 0.086*** (0.002) |
| X_2 | 家庭支持能力 | 0.058*** |

| | | |
|----------|----------|---------------------|
| | | (0.003) |
| X_3 |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 | 0.207*** (0.003) |
| X_4 | 外出务工时间 | 0.153*** (0.004) |
| X_5 | 家庭老龄化程度 | 0.041*** (0.004) |
| X_6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145*** (0.003) |
| X_7 | 户主年龄 | 0.012*** (0.004) |
| Constant | 常数 | 0.267*** (0.004) |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家庭老龄化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关怀和支撑，从而增强适应性指数。而户主年龄和本地家庭成员数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适应性。

(2) 模型调整与优化

根据模型 2 分析结果显示， X_1 和 X_3 对 R 的影响不显著，而从相关性分析可知，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功能完整性，本地家庭成员数量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因此，重新设定模型对因变量 R 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建立的模型为：

$$R = \beta_0 + \beta_1 X_1 \times X_3 + \beta_2 X_2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6 X_6 + \beta_7 X_7 + \epsilon_2$$

重新对模型 2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调整优化后模型 2

| 自变量 | 变量含义 | 系数 |
|------------------|------------------|----------------------|
| $X_1 \times X_3$ | 家庭功能完整性×本地家庭成员数量 | -0.053*** (0.010) |
| X_2 | 家庭支持能力 | 0.104*** (0.005) |
| X_4 | 外出务工时间 | -0.09*** (0.008) |
| X_5 | 家庭老龄化程度 | 0.206*** (0.007) |

续表 4.11 调整优化后模型 2

| 自变量 | 变量含义 | 系数 |
|----------|---------|----------------------|
| X_6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342*** (0.006) |
| X_7 | 户主年龄 | 0.064*** (0.008) |
| Constant | 常数 | -0.062*** (0.008) |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结果显示， X_1 和 X_3 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家庭功能完整性与本地家庭成员数量之间存在的交互作用对 R 有显著影响。且其交互作用对敏感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家庭功能完整性与本地家庭成员数量的交互作用越大，暴露度就越低。

4.5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除了家庭化流动的相关因素，收入作为人口进行流动行为的主要目的，对降解家庭生计脆弱性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本部分将家庭人均月收入作为自变量，并分析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家庭生计脆弱性中的机制作用。将所有的流动人口家庭样本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因变量为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暴露度、敏感度和适应性，自变量为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家庭基本特征，其中家庭基本特征仍然用本地家庭成员数量，外出务工时间和家庭老龄化程度作为变量。

从表 4.12 可以看出，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概率小于 0.000，说明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有比较显著的负影响，即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月收入提高会使生计脆弱性降低；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暴露度、敏感度以及适应性的影响系数都为正，并且显著性概率都为 0.00，因此家庭人均月收入对三者具有显著影响。

表 4.12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 变量名称 | 生计脆弱性 | | 暴露度 | | 敏感度 | | 适应性 | |
|----------|--------|-------|--------|-------|--------|-------|--------|-------|
| | 回归系数 | P> t |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0.030 | 0.000 | 0.536 | 0.000 | 0.475 | 0.000 | 0.448 | 0.000 |
|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 | 0.025 | 0.000 | -0.159 | 0.000 | -0.320 | 0.000 | -0.115 | 0.000 |
| 外出务工时间 | -0.079 | 0.000 | -0.125 | 0.000 | -0.393 | 0.000 | 0.127 | 0.000 |
| 家庭老龄化程度 | 0.013 | 0.633 | 0.110 | 0.005 | -0.048 | 0.276 | 0.143 | 0.000 |
| 户主受教育程度 | 0.016 | 0.683 | 0.163 | 0.004 | 0.060 | 0.342 | 0.173 | 0.000 |
| 户主年龄 | -0.073 | 0.007 | -0.279 | 0.000 | -0.086 | 0.043 | -0.076 | 0.000 |

4.6 结果分析

家庭功能完整性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适应性和敏感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对适应性有着显著的加强作用。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暴露度，但是整体而言家庭功能完整性能显著降低家庭生计脆弱性。家庭支持能力虽然提高适应性，但同时也提高了暴露度、敏感度和家庭生计脆弱性。家庭支持能力在流动人口家庭脆弱性作用的同时具有正负影响。但是，暴露度和敏感度的负面影响大于适应性带来的正面影响。结合上文得流动特征可知，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学历较低，而家庭支持能力越高侧面反映出其成年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教育成本使家庭负担加重。因此，家庭支持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计脆弱性。

本地家庭成员数量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有显著负影响，对敏感度有显著的负影响以及对适应性的正影响，说明本地家庭成员数量通过降低敏感度、提升适应性，从而降低了家庭生计脆弱性。由于家庭成员的增加，家庭在流入地能获取更好的情感支撑和社会融入感，因此生计脆弱性也随之减少。

外出务工时间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暴露度和敏感度均有着显著的负影响，对适应性有着显著的正影响。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得到熟练的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提高适应性，最终降低自身生计脆弱性。

家庭老龄化程度对流动人口的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在暴露度和敏感度的影响下，家庭老龄化程度对生计脆弱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生计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影响，但是其暴露度、敏感度以及适应性均为显著的正影响。这表明家庭人均月收入是通过提高适应性从而降低生计脆弱性。家庭人均月收入最直接的体现是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这可以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流动人口也能够有条件拥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与服务，从而提高生活品质。

5 流动人口家庭生计的解决策略

降低流动人口家庭暴露度和敏感度和增强流动人口家庭适应性是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的有效办法。流动人口的健康权益等缺乏有效保障，留守家庭所隐藏的各种风险仍未找到更好的应对办法，这使当地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脆弱性较高。有效化解流动人口生计风险、降解其生计脆弱性，迫切需要政府和流动人口自身这两方的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应做好流动人口生计发展保质保量的引路人，流动人口应积极维护自身权益、选择可持续生计发展道路。依据以上思路，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5.1 完善家庭保障政策，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家庭支持政策有利于保持家庭稳定，改善家庭代际关系，增强家庭应对危机的能力。流动人口的家庭老龄化和子女教育成本对家庭生计脆弱性产生了显著消极影响，进一步细化家庭支持政策可以帮助流动家庭提高家庭赡养能力和降低家庭教育压力，促进该群体适应和融入新时代。

针对流动家庭的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需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关注留守老人救助和帮扶。通过公共服务的介入来帮助家人及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状态。例如，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建设。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的缺失是流动家庭赡养功能减弱最为直接的体现。基于此，基层组织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和城镇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以使得留守老人安享晚年生活为落脚点，积极维护留守老人权益保障，并督促家人履行关爱职责，增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安全监护、权益维护等基本服务。各基层组织应采取电话问候、上门访问等方式，定期探访留守老年人，及时了解留守老年人生活情况，将存在安全风险和生活困难的留守老年人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二是提升对流动家庭老人的直接经济支持政策。根据流动家庭的具体情况和老人的经济条件与健康状况，给予流动家庭老人直接的经济补贴、照护补贴和医疗补助，提高老人自身的经济支配能力，完善养老市场服务供给。

强化流动人口家庭的抚养功能，降低教育成本。一是完善家庭福利制度，

对脆弱性较高的流动家庭，通过减少家庭税负、发放教育津贴等方式，减轻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经济压力。二是增强家庭福利政策的普惠性，将政策范围有效且精准的覆盖到脆弱性流动人口家庭。三是提高流动人口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面对流入地的优质教育资源，流动人口家庭往往比流入地居民花费更高的成本获取资源。也就是说，优质教育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的随迁子女存在门槛。因此，政府应立足家庭视角将优质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给流动人口家庭的随迁子女，积极应对新时代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问题，完善流动人口方面的家庭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负担，进一步提高其家庭发展能力。

5.2 完善家庭支持能力，降低流动家庭生活成本

社会保障作为维护社会公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流动人口在生计发展中抵御各类风险的重要支撑。因而各级政府应注重流动人口群体的权益状况，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保障能力，提高流动家庭在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待遇，降低流动家庭生活成本，实现各阶层风险共担。

在新时代，新业态带来新兴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动人口涌入新业态岗位，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是新就业形态对社会保障的适应性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是企业逃避缴费责任。因此，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必须立足于新时代，加强社会保障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适，以不断增强社会保障的适应性和实用性，提高社会保障工作的预见性。树立新发展理念，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结构灵活调整，完善社会保障有序运行机制，不断推动社会保障朝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此外，应强化流动人口的法治意识和权益意识，鼓励其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并且健全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障机制，增强流动人口的主动性。例如逐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摒弃制度性歧视和排斥流动人口的行为方式，在制度上确保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具有平等的权益保障，维护流动人口应有的合法权益。对于企业的逃避责任行为，应加强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监管，以法律进行刚性的约束和支撑，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政府应善于使用现代化数字技术，推进社会保障领域的审查全覆盖、扎实推进社会保障大数据审计，推进社会保

障治理效能。

以住有所居为目标，积极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改革。在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上，应优先关注无法租房的低收入住房贫困群体。对此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政策性租房的建设。同时推动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推进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针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给，在制度上逐步提高住房保障对流动人口的覆盖水平。最后，政府也应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要在住房质量、配套设施和周边环境等方面设定标准，提高流动人口居住质量。

综上措施的实行都可以较好的降低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和风险来临时的冲击所需要的突发性支出，这可以很好的缓解家庭脆弱性水平，更好的加强流动人口的生计可持续性功能。

5.3 建立针对性培训机制，提高就业能力

就业既是流动人口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改善和保障流动人口生计发展的根本条件。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偏低，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均不高。而就业技能培训是提高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重点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等针对性培训服务，提高流动人口适应新时代中新兴就业岗位的就业能力。

首先，政府应加大财政力度，建立健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购买流动人口培训服务的机制。在提供流动人口的各项培训服务和技术交流活动的同时，向参与培训的流动人口发放一定的津贴，提高培训参与率。加大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充分考虑流动人口各层次文化群体的需要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实际需要，提高培训质量。

其次，政府应因地制宜，灵活开展培训工作。各级政府结合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向及特点，并深入了解当地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与技术特点，加强与招聘企业的交流合作，提供与流动人口实际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同时可通过减免相关税费等优惠政策的实施，鼓励企业招用流动人口提供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从而增加流动人口就业的多样性，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

最后，定期对政府购买服务进行绩效评估。全面了解技能培训工作进展，对其执行结果进行综合性评价，不断完善和改进培训工作，保障流动人口存量及增量得到实用培训，提升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对新时代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4 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的相应建议

针对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的建议，本部分分为就业能力和学习能力两个方面：

关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人力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强弱，流动人口就业能力越高，越有机会获得高质量就业的机会。因此，流动人口应加强竞争学习的氛围和意识，从自身出发，积极参与继续教育或技能培训，提升流动人口就业竞争力。第二，社会资本能够拓宽流动人口的就业渠道、及时获取就业信息和增加工作选择。因此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互帮互助协会或组织，增强其社会资本，自身根据自身条件自愿参与，提高共同防范风险能力，增强城市归属感。

流动人口也应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一是提高流动人口认识事物的熟练速度。在流动人口的就业技能培训中，往往会过于注重某一种行业或职业技能或岗位技术的培训，这会造成流动人口的就业技能单一，获取其他新技术的能力缺失，因而流动人口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升认识事物的熟练速度，在就业中积累工作经验，为以后的就业发展奠定基础。二是流动人口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增强自主意识。流动人口作为流入地的弱势群体，自身权益容易受到损害。因此流动人口在加强自身技能培训的基础上，同样要培养自身的法治思维，塑造自身的基本权利意识、维权意识和公平公正意识，善于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是流动人口必须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理性规划职业方向。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的高薪职位进一步更加吸引流动人口，在各种机遇面前流动人口应理性思考，综合考虑工作的质量和稳定性，企业的信誉度和前途发展等方面，根据自身承受风险能力合理选择工作岗位。同时，流动人们在流入地遇到就业不稳定、生活质量差的状况，或者在流出地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时，应考虑是否返回流出地。通过在流入地学习到的知识技能和资金积累，适时发展替代性生计。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研究利用 2017 年流动人口家庭动态监测数据，深入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风险现状，进而以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机理研究为基础，对影响进行实证验证。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依据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发展和现状，总结流动人口当前面临的生计风险。首先是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进入新时代，流动人口群体中新形态就业者人数增多。但是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并不能享受到其应有的劳动权益保障。并且根据上文统计，仍有一部分流动人口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一旦遇到风险冲击，极易陷入困境。其次是流动人口提升就业质量受限。流动人口的学历较低，甚至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工作技能培训，致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毫无就业竞争力，只能从事于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长此以往，流动人口的身心极易受到摧残，甚至产生健康风险。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部分技术含量较低行业极易被取代，从而陷入失业风险。然后是流动人口的家庭住房水平低，以及居住质量低。住房作为流动人口的基本需求，深刻影响其居留意愿和生活质量。最后是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人口流动的同时，也产生留守老人问题。即使子女给与留守老人丰厚的经济支持，但是长期缺失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并不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反而会使流动人口陷入养老风险中。

第二，文章通过计量回归模型，发现家庭功能完整性能显著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生计脆弱性，并且提高社会适应性。我们观察到家庭功能完整性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暴露度和敏感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对适应性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家庭支持能力在子女求学成本的条件下会增强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根据流动人口流动特征也可知，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学历较低，这也就意味着家庭中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且处于上学状态，家庭教育成本加重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

第三，外出务工时间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生计脆弱性，并且对其家庭人均月

收入提高的影响比较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随着自身务工经验的积累和工作技能的提高，工资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带动其他家人一起流动，丰富家庭收入的多样化来源。

第四，家庭老龄化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暴露度和敏感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家庭老龄化程度越高，一方面意味着该流动家庭养老负担越沉重，致使暴露度指数增加，敏感度提高。在另一方面，家庭老龄化程度高意味着家庭成员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者资产积累，因此家庭老龄化程度对流动人口的适应性为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在暴露度和敏感度的影响下，最终家庭老龄化程度对生计脆弱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第五，流动人口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生计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影响，对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影响，这是由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家庭生计资产，同时还可以拥有更优质的社会保险，从而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服务与保障水平。

6.2 展望

本研究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现状及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家庭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进行更加全面的探索，进一步客观分析实证数据，因此研究发现对流动人口的生计发展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用意义。受限于作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及认知范围，加上时间、社会经验和研究经验的限制，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认知仍旧存在诸多不足：（1）采用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的 2017 年数据，缺少当地居民的比对数据。在测度家庭保障水平、生计脆弱性指数等方面，未能全面、客观及准确地与当地居民进行对比分析。（2）构建的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指标测量体系有待完善。针对流动人口这一特定群体的家庭生计脆弱性指标测量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对部分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针对以上几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以便未来继续改进完善：首先，在研究条件允许的条件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通过问卷的形式，增加当地居民的样本数据与流动人口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找出更

具针对性的脆弱性解决策略，以及尽可能尝试组合运用多种测量方法，观察对生计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准确性，选取精确度更高的方法对流动人口生计脆弱性水平进行精确测度。

参考文献

- [1]Awumbila, Mariama, and Elizabeth Ardayfio-Schandorf. Gendered poverty, migration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female porters in Accra, Ghana[J].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2008: 171-179.
- [2]Blackmore Ivy, Iannotti Lora, Rivera Claudia, Waters William F.,Lesorogol Carolyn. Land degradation and the link to increase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ies among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the Andes of Ecuador[J]. Land Use Policy,2021,107.
- [3]Blukacz Alice, Cabieses Báltica, MezonesHolguín Edward, Cardona Arias José Manuel. Healthcare and social needs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Latin America: analysis of the Chilean case.[J]. Global health promotion,2022.
- [4]Chambers, Robert, and Gordon Conway.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M].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 1992.
- [5]Chandni Singh PhD, Ritwika Basu. Moving in and out of vulnerability: Interrogating migration as an adaptation strategy along a rural–urban continuum in India[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2020,186(1).
- [6]DFID.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M] .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68-125.
- [7]Frankenberger T D, Maxwell M. Operational Household Livelihood Security: A Holistic Approach for Addressing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R]. CARE, 2000.
- [8]Jia Xu, Makoto Takahashi. Progressing vulnerability of the immigrants in an urbanizing village in coastal China[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20,23.
- [9]John Knodel, Chanpen Saengtienchai. Rural parents with urban childre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Thailand[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07,13(3):193-210.
- [10]Lasse K.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M]. Stockholm: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01:

42-98.

[11]Micah B. Hahn, Anne M. Riederer, Stanley O. Foster.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ssessing risks from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A case study in Mozambique[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9,19(1):74-88.

[12]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1,101(408):1163-1178.

[13]Mohammed, Kerime, and Degefa Tolossa. Contribution of remitt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s: the case of Tehuledere Woreda, Northeastern Ethiop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228-240.

[14]Mosiuo B. Makhata, Maake J. Masango. Illegal migrant Basotho women in South Africa: Exposure to vulnerability in domestic services[J]. *HTS T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2021,77(2).

[15]Oded Stark, David E. Bloom.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2):173-178.

[16]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48(2):167-235.

[17]Solomon S, Manning M, Marquis M, et al. Climate change 2007-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Working group I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PCC[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Stark O, Yitzhaki S. Labour migration as a response to relative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1988,1(1):57-70.

[19]Turra Cassio M, Elo Irma T. The Impact of Salmon Bias on the Hispanic Mortality Advantage: New Evidence from Social Security Data.[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2008,27(5):515-530.

[20]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29.

[21]Xu Zhao, Chen Chi, Xin Gao, Yuefang Duan, Weijun He. Study on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Employees in Relocation Enterprises: A Case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0,17(1).

[22]蔡洁,夏显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个体响应与政策意蕴——基于陕西省 2055 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6(10):29-37.

[23]陈辉,周蓉瑶.生计模式、婚姻市场与家庭发展压力——基于“半工半耕”与“半工半租”的比较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02):139-143.

[24]陈良敏,丁士军,刘国顺.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67-74+164-165.

[25]冯伟林,李树苗.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6,22(04):2-9.

[26]淦宇杰,张龙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分析——基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09):10-21.

[27]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七号)[N].中国信息报,2021-05-12(004).

[28]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06):42-50+96.

[29]贾洪波.户口、劳动合同影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的比较分析——基于 6 省 18 市调研数据的负二项回归模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10):73-85.

[30]贾洪波.劳资博弈视角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02):86-98.

[31]雷晓康.推动我国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06):108-116+156-157.

[32]李宝礼,邵帅,裴延峰.住房状况、城市身份认同与迁移人口环境行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1):90-99.

[33]李建民,王婷,孙智帅.从健康优势到健康劣势:乡城流动人口中的“流行病学悖

- 论”[J].人口研究,2018,42(06):46-60.
- [34]李龙,宋月萍.家庭发展理论的三种基本导向及启示[J].社会建设,2020,7(05):58-69.
- [35]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02):1-8+70.
- [36]李树茁,杨绪松,悦中山,靳小怡.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67-76.
- [37]李树茁,张丹,王鹏.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与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21,43(05):20-28.
- [38]李勇辉,李小琴,沈波澜.安居才能团聚?——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推动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19,45(12):32-45.
- [39]梁海艳.中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9,25(04):44-52.
- [40]梁土坤.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三维分析:一个文献综述[J].西北人口,2015,36(04):24-28+34.
- [41]林李月,朱宇.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以福建省为例[J].人口研究,2008(03):48-56.
- [42]刘成斌,高翔.劳动力外流对城乡养老风险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8(03):51-61+127.
- [43]刘璐琳,余红剑.可持续生计视角下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03):39-45.
- [44]刘涛,王德政.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J].人口研究,2021,45(04):85-99.
- [45]路锦非,王桂新.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评估[J].人口学刊,2019,41(06):5-18.
- [46]罗小琴,桂江丰.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障的行为及成因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20(06):43-50+109.
- [47]骆新华.国际人口迁移的基本理论[J].理论月刊,2005(01):42-45.

- [48]吕利丹,阎芳,段成荣,程梦瑶.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人口变动基本事实和发展挑战[J].人口研究,2018,42(03):65-78.
- [49]孟凡强.户籍歧视与农民工参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代际差异[J].广东社会科学,2021(03):35-43.
- [50]綦松玲,鲍红红,刘欣,赵龙宇.吉林省流动人口就业和居住情况研究[J].人口学刊,2014,36(05):87-95.
- [51]尚越,石智雷.城乡迁移与农民工心理健康——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J].西北人口,2020,41(04):104-113.
- [52]尚越,石智雷.迁移行为对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影响[J].调研世界,2020(02):30-36.
- [53]石郑.流动人口健康自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江汉学术,2020,39(02):17-28.
- [54]石智雷,施念.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护不平等——农民工、外来市民和本地市民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02):56-68.
- [55]石智雷,施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20(02):33-43.
- [56]石智雷,施念.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市民化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6(04):50-58.
- [57]石智雷,薛文玲.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03):143-152.
- [58]石智雷,朱明宝.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03):49-58+159.
- [59]宋全成,封莹.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9(08):34-46.
- [60]宋全成,甘月童.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21(04):63-72.
- [61]苏丽锋.帮扶农民工群体保就业的应对策略分析[N].中国劳动保障报,2020-07-22(003).
- [62]苏丽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征与就业质量研究[J].民族研究,2015(05):16-29+123-124.

- [63]陶树果,高向东,方中书.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基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西北人口,2018,39(02):88-95.
- [64]王桂新.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新动向的考察——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的初步解读[J].人口与经济,2021(05):36-55.
- [65]王培刚.把握流动人口特征变化趋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04(005).
- [66]王小龙,兰永生.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健康与农村养老公共服务供给[J].南开经济研究,2011(04):21-31+107.
- [67]王亚军,郑晓冬,方向明,陈典.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J/OL].农业技术经济:1-18[2021-12-19].
- [68]王雨,陈鹏,张京祥.基于新“推—拉”作用的“乡—乡”人口流动与治理应对研究——基于西昌市农民自主搬迁的实证[J].现代城市研究,2021(08):17-23.
- [69]王跃生.中国城乡老年人居住的家庭类型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4(01):20-32+126.
- [70]文萍.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状况与设施规划启示[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都市人民政府.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 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21:9.
- [71]吴华安,杨云彦.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特征与趋势:一个综述[J].西北人口,2011,32(04):105-110.
- [72]吴玉锋,雷晓康,聂建亮.从“结构”到“认知”: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J].人口与发展,2019,25(05):111-122.
- [73]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 [M].蒋斌,张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6.
- [74]向洪,张文贤,李开兴 主编.人口科学大辞典[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第 674-675-676 页.
- [75]肖宝玉,朱宇,林李月.多维耦合视角下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研究——以福

- 厦泉城市群为例[J].人文地理,2021,36(02):120-126.
- [76]杨菊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劳动强度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03):78-86.
- [77]杨铭,王任远.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性别收入差异——基于动态博弈模型和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J].经济问题,2019(09):62-72.
- [78]杨胜利,王伟荣.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与流动人口收入——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12):49-62.
- [79]杨胜利,姚健.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J].南方人口,2021,36(01):31-42.
- [80]岳崴,王雄,张强.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J].中国工业经济,2021(10):175-192.
- [81]张丽琼,朱宇,林李月.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 2013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南方人口,2017,32(02):1-12.
- [82]张学浪,笪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源分析及防范策略[J].农村经济,2020(01):137-144.
- [83]赵锋,杨云彦.外力冲击下水库移民生计脆弱性及其解决机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9(04):1-7+19.
- [84]赵如婧,周皓,彭成琛妮.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研究——基于 2010-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人口与发展,2021,27(06):22-35.
- [85]郑晓冬,方向明.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基于路径分析方法的检验[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22(08):188-198.
- [86]朱玲,何伟,金成武.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养老照护变迁[J].经济学动态,2020(08):3-19.
- [87]左婷,苏武峥,赵梦媛.提升抗逆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应对策略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0(04):129-136+178-179.

致 谢

三年求学时光转瞬即逝，转眼间又是一年毕业季。这三年的学习和论文撰写过程，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使我更加深刻的理解所学的专业知识。在这期间，既锻炼了我在处理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也丰富了自身的人生经历。我很幸运能够成为母校的一员，让我能够在彼此温暖、气氛融洽的环境中不断进步、充实自我，见证我从一无所知走向略有所知的求索路。借此机会，向所有帮助过我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祝福。

衷心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赵锋老师。正是赵老师的谆谆教诲，本篇论文才能得以完成。论文经历了开题、文献收集与整理、数据整理与分析 and 论文正文写作的各个阶段，赵老师给我推荐了大量文献资料，明确论文方向和构思，并给予我很好的指导和帮助。从开题到定稿，赵老师多次认真审阅和耐心指导，让本篇论文不断完善。对此我内心十分感激赵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教导，也祝愿赵老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顺遂无忧！

感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全体老师，由于他们的悉心教导和关怀，我学到了专业知识和论文写作方法，并对本篇论文的修改提出宝贵建议，使本篇论文更加完善。同时，也要感谢同门的师兄师姐，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关心。还要感谢我可爱的室友们吴鑫悦、张续续和甄妮同学，是你们和我维系着姐妹般的感情，让我的生活和学习始终充满温馨。感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其他同学，在这三年里给予我帮助和支持，永远期待与你们的下一次相遇。感谢我亲爱的闺蜜涂小可、邬秋玥、黄书婷和李叶杨，是你们在我烦躁不安时给予包容和安慰，在我情绪低落时给予鼓励和支持，谢谢你们的一路相伴。

感谢我最爱的父母。正是他们无私的支持、包容和陪伴，才使得我能够专注学习，顺利完成学业。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你们陪我长大，我伴你们到老。

纸短情长，道不尽太多感谢。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将铭记师长们的教诲，继续努力，以期实现人生价值。